

## 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 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 自然史研究活動

戴麗娟\*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耶穌會士所扮演的角色早已受學界注意，但現有的討論多集中在明末清初一段，對於清末與民國時期的相關研究仍不夠多。本文以法國耶穌會士在十九世紀後半的上海所建立的一個自然史博物館為對象，試圖回溯這個存在了八十多年、如今卻已遭人遺忘的科學機構之歷史面貌。

論文以該機構所經歷的兩個時期為主軸，分析其發展重點。第一個時期是徐家匯博物院時期（1868-1930）：在這個奠基時期，創始人韓伯祿神父與其繼任者的工作重心是厚實博物院的生物標本收藏與系列研究，而其收藏之豐，曾被譽為東亞第一。在研究成果發表方面，從博物院自身的出版品中，可看到土山灣孤兒院青年學徒所製作的博物學圖版，顯現出這方面的技術之引進與傳承。而在與當地科學社群交流方面，徐家匯博物院除了提供標本鑑定的服務外，也與亞洲文會所設立的上海博物院有許多合作關係，包括培養出中國第一批動物標本剝製師。

第二個時期是震旦博物院時期（1930-1952）：遷入震旦大學的徐家匯博物院在此時更名，並與大學課程充分配合，發揮教育功能。而在知識交流上，博物院此時更積極尋求與當時中國第一代生物學人才合作，尤其是昆蟲學方面的人才，這點可從成果出版中觀察到。最後，從這個時期的展覽可看出，博物院不僅注重研究與教育，也開始加強科普的功能。

一九五二年，在戰後試圖繼續發展的震旦博物院仍不敵政局改變的壓力，與震旦大學一起被迫關閉。這個由法國耶穌會士主持的上海科學機構從此逐漸被遺忘，而它在中國現代生物學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值得我們重新認識。

**關鍵詞：**法國耶穌會士 徐家匯博物院 震旦博物院 上海博物院 上海科學事業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研究為筆者國科會計畫「當宗教任務與科學任務相遇——桑志華神父的北疆博物院與科學資訊網絡」(NSC97-2410-H-001-022-MY3) 所衍生的成果之一，感謝國科會的支持。

## 一・前言

關於耶穌會在中西科學與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過去許多研究都集中在明末清初一段，<sup>1</sup> 對於離我們較近的清末、民國一段，也就是耶穌會二度來華後的作為，相關研究的數量反而不多。若以這段時期耶穌會在中國所建立的教育、文化、科學事業之規模與多樣性來看，至今仍有許多未被研究的面向。筆者延續個人先前的研究，<sup>2</sup> 試圖於此探索一個多少被遺忘的自然史博物館，亦即法國耶穌會士在十九世紀晚期所建立的上海徐家匯博物院。事實上，這個博物館曾被民初關心中國博物館事業的論者公認為中國最早的現代博物館，<sup>3</sup> 然而目前學界對其認識卻十分有限，相關的專門研究更是幾近於零。本文之目的即是試圖填補這個空白，同時為將來更進一步的整合研究建立基礎。

在進入細節分析之前，我們首先要瞭解的是該博物館的成立與耶穌會二度來華這段歷史之間的關係。創立於一五三四年的耶穌會，在運作兩百多年後，因內部衝突以及「禮儀之爭」等等問題，在一七七三年遭教宗克來蒙十四世 (Clement XIV) 下詔解散，直到一八一四年才獲教宗庇護七世 (Pius VII) 允許恢復傳教活動。在中國地區，雖有教徒極力爭取，卻仍要等到一八四二年，才見到復教後的

---

<sup>1</sup> 有關該時期的相關研究概況，可參考：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7.1 (1996)：137-169；許明龍，〈中國學界近年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之管見〉，古偉瀛編，《東西交流史的新局：以基督宗教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25。

<sup>2</sup> 筆者是從先前進行過的法國耶穌會士之科學活動研究中，注意到這個自然史博物館的存在。請見：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95-161；戴麗娟，〈在「邊緣」建立「中心」——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輔仁歷史學報》24 (2009)：229-256。

<sup>3</sup> 相關調查主要是由成立於一九三五年的中國博物館協會之成員執行，調查結果則集結成《中國博物館一覽》（北平：中國博物館協會，1936）。有關該協會之成立經過與宗旨，初步可參考：《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第一卷第一期，出刊於一九三五年九月。至於這個「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說法，晚近有學者提出質疑：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2012): 575-586. 筆者於此要感謝朱瑪瓏博士提供此論文出版訊息。不過由於本文重點並不在追究何所博物館是中國第一個現代博物館，所以對此問題將存而不論。

首批耶穌會士來到上海，正式重新開始在江南地區的傳教活動。<sup>4</sup> 由於此時北京教區已由遣使會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負責，耶穌會因此選擇將中國傳教事業之總部設於上海徐家匯——亦即徐光啟墓地所在、徐氏後人群居之處——並且陸續展開多項基礎性規劃。一八五六年教廷實施教區行政改制後，原來的北京教區及南京教區被取消，改成四個代牧區，其中江南代牧區（包括江蘇與安徽）和直隸東南代牧區即正式分配給耶穌會負責。<sup>5</sup> 當時，江南代牧區主要由法國巴黎教省派出的耶穌會士來主事，而直隸東南代牧區則多由法國香檳教省的耶穌會士負責。本文所探討的徐家匯博物院即於此背景下產生。

至於博物院本身的歷史，一般被區分為兩個時期來敘述：第一個時期從該博物院創始人韓伯祿神父 (Pierre Marie Heude, 1836-1902) 抵達中國的年代（一八六八年）算起，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博物院與震旦大學結合為止。在這段期間，此機構一直是以「徐家匯博物院」(Musée de Zi-ka-wei) 見稱於世。第二個時期則始於一九三〇年，直到震旦大學與博物院皆因時局變化而在一九五二年終止活動為止。在這段期間，韓伯祿的繼任者將博物院遷移到震旦大學校內，而震旦大學也為此興建一個全新的建築物來容納日益增多的收藏。也是在這個時期，該機構之中文名稱改為「震旦博物院」，外文名稱則是 Musée Heude，以紀念其創辦者。

這個適用於簡史的編年敘述若要細究起來，其實是需要加以說明的。因為在韓伯祿神父抵華之初，儘管教會在當地已有少許標本收藏，也希望韓伯祿神父來加強這方面的採集，但究竟能否成立一個博物館則還是未知數。所以嚴格而言，一八六八年並不能算是博物館的起始日期。必須要等到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

---

<sup>4</sup> 首批三位皆是法國籍教士，分別是南格祿 (Claude Gotteland, 1803-1856)、艾方濟 (François Estève, 1806-1848)、李秀芳 (Benjamin Brueyre, 1810-1880)，見 Joseph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Jesuites de la Province de France (Paris)* (Zi-ka-we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14), vol. 1, pp. 40-41. 此處教士之中文名則是參考 Rolf Gerhard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M. E. Sharpe, 2009), p. 41. 由於一八四九年的洪災及一八五〇年的飢荒，加上太平天國之亂，江南教區其實直到一八六〇年代才開始較穩定地發展。

<sup>5</sup> 一八五六年五月三十日，教廷將原北京主教區改為三個宗座代牧區：冀北、冀東南、冀西南，而原來的南京主教區則改為江南代牧區，見趙慶源編著，《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臺南：聞道出版社，1980），頁 36。宗座代牧區的地位等同於教區，其中冀東南代牧區復於一九二四年改名為獻縣代牧區。

江南宗座代牧朗懷仁主教 (Adrien Languillat, 1808-1878)<sup>6</sup> 正式發佈建立這個自然史博物館的命令，並且授予韓神父相關權責，博物院才正式被列為耶穌會江南代牧區之執行項目，而且是與其他科學計畫同時進行的。

一八七二這一年，朗懷仁主教與江南代牧區耶穌會會長谷振聲神父 (Agnello Della Corte, 1819-1896) 共同召開會議，決定在徐家匯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Comité scientifique de Kiang-Nan)，展開科學和文化傳教工作。委員會初分四個小組：第一組負責氣象觀測台與科學出版，交由高龍鞏神父 (Auguste Colombel, 1833-1905) 主持；第二組負責自然史研究，由韓伯祿神父主持一個博物館，並出版相關研究成果；第三組專門進行中國歷史及地理的研究，由費賴之神父 (Aloys Pfister, 1833-1891) 負責；<sup>7</sup> 第四組專責籌備中文出版品所需的各種材料，包括科學及傳教類，初期交由兩位中國籍神職人員馬建常 (Joseph Ma, 1840-1939)、<sup>8</sup> 馬建忠 (Matthias Ma, 1845-1900) 兄弟負責——但馬氏兄弟在一八七〇年代中期先後離開耶穌會，轉任中國政府要職。<sup>9</sup> 由此可知這些科學研究事業起初是同步規劃的，後來隨著各方面的條件不同而有各自的發展。徐家匯著名的觀象台（有些中文文獻翻譯成天文台、氣象台）、博物院皆在這個背景下成立，而且在資金及工作人員等方面，幾乎完全由耶穌會獨力支撐。由於教會初期經費只夠興建觀象台的實體建築物（竣工於一八七三年），博物院的建築物因此遲至一八八三年才得以完成，其地點就在徐家匯耶穌會總院之南，離觀象台不遠處。<sup>10</sup> 這些科研機構的陸續完成，加上原有的徐家匯藏書樓（一八四七年創立）、徐匯公學（一八

<sup>6</sup> 朗懷仁在一八四一年加入耶穌會，一八四四年抵達上海浦東傳教，一八五六年出任直隸東南區宗座代牧，一八六四年調任江南宗座代牧，直到一八七八年在任內過世。

<sup>7</sup> 費賴之神父主要負責整理徐家匯藏書樓圖書以及明清之際在華耶穌會士所留下的文獻、檔案與著作，同時要記錄江南教區的傳教發展等等。在他名下留下許多參考資料，例如《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等等，有助於後人瞭解入華耶穌會的早期人物。

<sup>8</sup> 即馬相伯，本名建常，後改名良，相伯為其字。有關馬相伯的研究頗多，有關他辦學的部份，讀者可參考黃書光，《國家之光人類之瑞：復旦大學校長馬相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sup>9</sup> 見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vol. 2, p. 194. 由於該書是以法文寫成，有關兩位中國籍神職人員之名，書中未附中文，此處以教名以及年代為依據，判斷應為馬建常、馬建忠兄弟。

<sup>10</sup> 見胡道靜，〈震旦博物院史略〉，上海通社主編，《舊上海史料匯編》（193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下冊，頁 379-391 中之簡圖。

五〇年創立）、<sup>11</sup> 後來的土山灣印書館等文教設施，構成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徐家匯人文薈萃、科技發達的面貌。

至於這些到中國傳教的神父進行此類科學事業的動機，我們或可從後來出任佘山天文台第一任台長的蔡尚質神父 (Stanislas Chevalier, 1852-1930)<sup>12</sup> 所留下的記錄來瞭解他們的心態：<sup>13</sup>

為了紀念昔日北京天文台對於中國境內的福音宣揚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希望能透過科學贏得中國士人的尊敬與信任，並且藉此讓他們信仰耶穌基督；想要讓開始陸續湧入上海、且多為新教徒的歐洲人更能接受我們的神職工作；有必要不讓那些不信教者獨佔自然科學，因為他們是如此容易而大膽地濫用它來欺騙外行人：由於這些想法的引導，朗懷仁主教與耶穌會長上創設了這個天文台。為了救贖眾生靈魂，藉由自然科學研究來彰顯上帝的無上榮光，此即創建此天文台的真正傳教目的。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當時天主教耶穌會士對於在中國傳教過程中同時進行的科學事業有多重動機：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延續明末清初之際傳教士所留下的光輝

<sup>11</sup> 關於徐匯公學創立至今一百六十年的歷史，可見庄小鳳、馬學強主編，《西學東漸第一校：從徐匯公學到徐匯中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sup>12</sup> 佘山天文台建於一八九九年，是繼徐家匯觀象台之後，神父們希望作更進一步的天文觀測，因而自法國引進一具大型雙筒折射望遠鏡，後來才陸續建設完成的。該望遠鏡當時是遠東最大的一具天文望遠鏡，現在則被認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望遠鏡。蔡尚質神父於一八八三年來到徐家匯，先在徐家匯觀象台（當時是以氣象與地磁觀測為主）工作，後成為佘山天文台第一任台長。有關此二觀測機構重要性的簡短描述，中文世界的讀者可參考：江曉原、吳燕，《紫金山天文台史稿：中國天文學現代化個案》（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 6-9。

<sup>13</sup> Stanislas Chevalier, *Histoire de l'Observatoire*, 此為天文台台史的手稿，似未正式發表，被引用於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vol. 2, p. 196. 此處中文譯文為筆者所譯，原文如下：“Le souvenir des immenses services rendus autrefois à la cause de l’Evangile dans le Céleste Empire, par l’ancien observatoire de Pé-king, l’espoir d’inspirer, par le moyen des sciences, le respect et la confiance aux lettrés chinois, afin de les gagner à Jesus-Christ, le désir de rendre notre ministère plus accepté des nombreux européens, protestants pour la plupart, qui commencent à affluer de plus en plus vers Chang-hai, la nécessité de ne pas laisser aux incrédules le monopole des sciences naturelles, dont ils abusent si facilement et si audacieusement pour tromper les ignorants, telles sont les pensées qui ont guidé Mgr Languillat et les supérieurs de la Compagnie dans cette fondation. La plus grande gloire de Dieu, procurée par l’étude des sciences naturelles, pour le salut des âmes, telle est la fin vraiment apostolique de cette fondation.”

傳統，以科學成就來贏得中國士人的重視；另一方面，他們必須面對日益增多的新教信徒，並與新教傳教者相競爭；最後，他們本來就對自然科學懷有抱負，認為耶穌會士不該在重要的新知發展中缺席，而且更應藉著這些方面的成就來榮耀上帝。這些想法並非蔡尚質神父個人的意見，而是普遍存在於當時天主教傳教士兼科學工作者的社群當中。從這樣的心態背景來看，耶穌會士從事天文地理研究、自然標本採集，甚至參與演化論的論辯就不令人驚訝了。

瞭解這些背景後，讓我們再回到自然史博物館的部份。如前所述，在一八七二年的規劃方針確立後，博物館專屬的實體建築卻因經費不足之故而遲至一八八三年才落成。儘管如此，在韓伯祿神父過世後，其繼任者為了感念他的貢獻，而習於將博物館的歷史上溯到韓伯祿神父抵華的那一年，將之視為博物館的開端。一九三九年，震旦博物院盛大舉行七十週年慶祝活動時，便是以一八六八作為起始年，而這個日期也被前面曾經提及的中國博物館協會調查者所沿用。又如著名的博物館學家曾昭燏（1909-1964），<sup>14</sup> 她在一九三〇年代末回顧中國博物館之沿革而撰寫成《博物館》一書，書中即稱此博物院創建於一八六八年，為中國最早的博物館，其次則是亞洲文會創於一八七四年的上海博物院。<sup>15</sup>

綜合上述可知，若我們依循耶穌會神父們傳諸後世的編年敘述，容易讓人誤以為這個創設博物館的計畫在韓神父抵華之際即已十分明確，而且順利進行，然而實際情況與此印象是有差距的。儘管如此，種種資料卻顯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徐家匯博物院創立於一八六八年」的說法已經成為大家公認的事實，一八七二或一八八三年的意義則普遍被略過。若就實際發展來看，不論是從一八六八

---

<sup>14</sup> 曾昭燏，湖南湘鄉縣人，其曾祖父曾國潢是曾國藩的四弟，家世顯赫。她於金陵大學國學研究所畢業後，一九三五年自費赴英國倫敦大學專攻考古學，一九三七年取得碩士學位。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受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委託與資助赴德國考察，研究博物館學，一九四三年出版之《博物館》一書即為其研究所得，當時被視為中國現代博物館學的奠基之作。一九三九年，曾昭燏受聘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設計委員，後任代理總幹事、總幹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博物院在一九五〇年三月正式更名為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初任副院長，後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升任為院長。有關其生平，可見李又寧，〈曾昭燏（1909-1964）——我國最傑出的女性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學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1993）：35-48。筆者感謝李貞德教授提醒此條參考書目。另外有關其專業領域的出版文字與日記、交遊等文獻，可見晚近出版品：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分為考古、博物館、日記書信三卷。

<sup>15</sup> 曾昭燏，《博物館》（重慶：正中書局，1943）。此書在出版前曾交由李濟審閱，後以兩人聯合署名的方式出版，見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博物館卷》，頁41。

或一八七二，甚至從一八八三年算起，徐家匯博物院都確實可被視為是中國現代博物館之先驅，因為排序第二的亞洲文會博物院也是在成立多年之後才稍具規模（詳後）。所以，為了尊重當時參與者及論述者的看法與記憶，筆者於此仍沿用一般習慣的編年架構來說明這個有八十多年歷史的博物館之發展過程。

## 二・徐家匯博物院時期 (1868-1930)

在博物院的草創階段，韓伯祿神父的個人建樹功不可沒。此時期的主要活動是廣泛收集標本，並加以整理、研究、發表；初期目標似乎是增進歐人對於中國生物的系統性認識，談不上與中國當地學人的知識交流。不過，從博物院的出版品以及當時一些零星報導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神父在標本繪製方面對上海當地孤兒的培養，以及博物院與上海當地同類機關之間的合作。以下就這些主要面向分三節論之。

### （一）韓神父之標本採集與研究

韓伯祿為法國西部布列塔尼人，一八五六年進入耶穌會，當時他正好滿二十歲。他自幼便喜歡觀察生物變化，進入耶穌會後，除了神學、哲學等必修課程外，仍在位於巴黎的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學習。一八六七年，朗懷仁宗座代牧返回法國招募年輕會士到中國協助傳教事業，時年三十一歲的韓神父由於此機緣而決定前往中國。<sup>16</sup> 從韓神父本人留下的筆記以及後人的整理可得知，他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從法國南部馬賽出發，一八六八年一月九日抵達上海，從此展開他在華三十多年的生涯。<sup>17</sup> 從一八六九到一八八〇年，他以當時的江南為主要範圍，總共進行了十多趟採集之旅。包括長江下游的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南京，中游的洞庭湖、鄱陽湖，漢水流域的漢中，乃至於淮河流域的安徽等地，都有他的足跡。在這段時間，他主要收集魚類、介殼類、龜類的標本。不過，這位愛好博物學的神父之活動範圍並不只限於

---

<sup>16</sup> Frédéric Courtois, "Le P. Heude et le musée de Zi-ka-wei,"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 5.2 (1906): 1-32, 關於朗懷仁與韓伯祿相遇的描述在第三頁。

<sup>17</sup> 有關韓神父抵華後最初幾年的活動，除了上述文章外，還可參考：Joseph Dehergne, "Les débuts d'un naturaliste en Chine: Les premiers voyages du Père Heude, d'après son Journal et ses Lettres (1868-1875),"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rd ser., 30 (1947): 192-243.

中國。從一八八〇年代中期到一九〇〇年七月在河內病倒為止，<sup>18</sup> 他也曾多次前往東南亞、東北亞，所以博物館收藏有當時安南、暹羅、馬來西亞、麻六甲諸島、滿洲、韓國、日本，甚至西伯利亞東部等地的動植物標本。根據後人的統計，他在三十年間曾走過的採集路線總共長達二十五萬公里，而在他所收藏的軟體動物中，就有多達五百七十二個新確認的物種。<sup>19</sup>

憑藉這些標本，他從一八七四到一八八五年間在法國陸續出版了十薄冊的《中國中部與南京地區河產介殼類》(*Conchyliologie fluviatile de la province de Nanking et de la Chine centrale*)，後來更將之集結成一部圖文並茂的巨冊著作。這些研究成果受到國際相關學界的重視，也奠定他在這方面的名聲。<sup>20</sup> 在此書中，他描寫了一百八十九種介殼類，其中約有一百五十種是先前未被發現過的新種。

此外，他也和其他當時在華的法籍探險家、外交官、傳教士一樣，經常將標本寄到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鑑定或收藏。該博物館因此在一八七四年授予他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通訊員 (*Correspondant du Muséum*) 的榮譽頭銜。一八八四年底，他返回歐洲作短暫居留（一八八四年十一月至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觀察到演化論所引起的迴響，對此現象十分不以為然。<sup>21</sup> 返華後，他雖仍繼續寄送標本到法國鑑定，但是對於自己在中國的採集工作有了新的看法：他希望能夠藉著在亞洲蒐集的大量標本及系統研究來駁斥演化論。也因此，從一八八〇年代中期開始，他的收集從過去以介殼類為主轉而以哺乳類動物標本為主，並且陸續將整理結果發表在徐家匯博物院的刊物《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 中。<sup>22</sup> 由於這種目的性的驅使，他這段時間的研究頗受爭議。許多人認為他在替新屬或新種命名時過於草率，未充分參考當時已經被命名的種類，導致一些在國際間已經完成辨識的動物標本又被他冠上不同的種屬名，對後人的研究造成困擾。這些批評對於他個人的

<sup>18</sup> 在河內的醫院經過治療與休養後，韓神父仍回到徐家匯，最後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於該地辭世。

<sup>19</sup> R. P. Flamet, "Le Musée Heude, ses fondateurs et ses richesses scientifiques,"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39 (1938-1939): 46-50.

<sup>20</sup> 例如法國介殼學的專業期刊編輯就大力讚揚這些出版的品質，並且邀請韓伯祿神父盡量在該刊物發表他在中國的發現，見 Henri Fischer, "Le R. P. Heude, nécrologie," *Journal de conchyliologie* 52.4 (1904): 372-376.

<sup>21</sup> Courtois, "Le P. Heude et le musée de Zi-ka-wei," p. 7.

<sup>22</sup> 該刊物自一八八〇到一九二〇年陸續以薄冊形式出版，每三至四份薄冊集結成一大冊，最後共出版了六大冊。韓神父的成果發表則集中於前四冊。詳細出版內容目錄可見附錄一。

學術聲名逐漸造成損害。另一方面，由於他與當時逐漸形成於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教授之間的主流看法背道而馳，所以博物館的教授們在自己的出版品中愈來愈少提到韓伯祿神父的名字，職是之故，後世對他所知不多。相較之下，亦曾在中國收集標本多年的法國遣使會神父譚衛道 (Armand David, 1826-1900)<sup>23</sup> 就顯得幸運多了：由於替法國科研機構蒐集了許多珍貴標本，而且在理論立場上相當接近當時的新趨勢，所以譚衛道深受自然史博物館教授們的重視，其名號在該機構的出版品中代代相傳，直到今日。<sup>24</sup>

然而，若不論韓伯祿神父個人研究上的這段曲折，而將焦點放在他在中國上海的博物館建設上，他的貢獻則是無庸置疑的。<sup>25</sup> 在當時的文章或指南中，由他個人收集而在博物館被永久保留的標本數量常被譽為東亞第一。由於積極採集與收購，他的標本數量與日俱增，很快受到同好的重視。早在一八七二年，韓神父就開始與當時在中國自然史領域的知名學者往來，彼此請益，例如譚衛道神父以及英國領事郇和 (Robert Swinhoe, 1836-1887)<sup>26</sup> 都曾經來看過他的收藏。<sup>27</sup>

<sup>23</sup> Armand David 於一八四八年進入遣使會，於一八六二年在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教授 Henri Milne-Edwards (1800-1885) 安排下赴中國蒐集當地標本，直到一八七四年返回法國定居前，在中國共進行了三次長程的採集之旅。許多中國物種是由他首次傳介進入歐洲，其中最為人知的是麋鹿與大熊貓。有關其生平，現有頗多英、法文研究，較完整的是 Emmanuel Boutan, *Le nuage et la vitrine: Une vie de Monsieur David* (Bayonne: Editions Raymond Chabaud, 1993). 中文世界的讀者可參考羅桂環，《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 220-236，不過其中有不少錯誤。

<sup>24</sup> 例如前述的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動物學教授 Henri Milne-Edwards 和 Alphonse Milne-Edwards (1835-1900) 父子在他們合作完成的著作中分析了許多由譚衛道神父從中國帶回的標本，而此巨著出版後又經常被同行引用，譚衛道神父的聲名因此不脛而走，見 Henri Milne-Edwards and Alphonse Milne-Edwards, *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 comprenant des considérations sur la classification de ces animaux* (Paris: G. Masson, 1868-1874). 另外，譚神父本身也與自然史博物館的教授 Emile Oustalet 合作完成一本中國鳥類的研究，該書也很快地成為相關領域的主要參考書，見 Armand David and Emile Oustalet, *Les oiseaux de la Chine* (Paris: G. Masson, 1877).

<sup>25</sup> 晚近一份關於震旦博物院之哺乳動物頭骨標本的研究對於韓神父當時命名所遭到的困難給了較持平的評價，並且肯定該批收藏對於認識亞洲地區動物的重要性，見 Anja Braun, Colin P. Groves, Peter Grubb, Yang Qi-Sen and Xia Lin, "Catalogue of the Musée Heude collection of Mammal Skulls,"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動物分類學報) 2001.4: 608-660. 該研究主要是檢視現藏於北京與上海，而原屬於震旦博物院的一批動物頭骨收藏，試圖以現行的分類與命名系統加以整理，對於該博物院歷史的描述則十分簡要。

<sup>26</sup>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的“Robert Swinhoe”條目，郇和出生於印度，一八五四年進入英國

一八八三年後，有了實體建築的徐家匯博物院基本上以研究為優先，並不特別注重對外展示或大眾教育。而且因為館內人手不足，所以當時有興趣的參觀者必須事先聯繫，方得入館，所以初期所知者不多。不過，博物館對中國當地的研究者提供鑑定方面的協助倒是不遺餘力。例如，前面已提到的上海博物院從一八七七年開始就請韓伯祿神父協助進行哺乳類動物的鑑定和整理。又如在華英人社群中頗有知名度的海關人員兼自然史學者韓爾禮 (Augustine Henry, 1857-1930) 也曾經請韓神父協助鑑定他所收集到的斑羚屬標本。<sup>28</sup> 而較晚才到上海定居的海關人員兼中國鳥類專家拉圖許 (John David Dignes La Touche, 1861-1953) 則曾多次與韓神父的繼任者栢永年神父 (Frédéric Courtois, 1860-1928) 在鳥類鑑定上交換意見。<sup>29</sup>

韓神父在一九〇二年初過世後，其繼任者主要進行的工作是整理已有的收藏，並且繼續擴大標本收集的範圍。這個任務首先由栢永年神父承擔。從一九〇二到一九二八年，他在博物館人手匱乏的情況下，仍然努力不懈地充實館藏。由於韓神父已經收集許多介殼類和哺乳類，栢神父此時遂把重心放在植物標本和鳥禽類標本的採集上。在他之後接任院長職位的松梁材神父 (Auguste Savio, 1882-1935) 在鳥類和昆蟲標本上都有貢獻，而鄭璧爾神父 (Octave Piel, 1876-1945) 則專注於昆蟲類的收集和研究，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博物館在昆蟲標本方面的不足。<sup>30</sup> 是以在一九二〇年代末，當博物院打算遷移到震旦大學校園內時，其本身可說是各類標本相當齊備的一個自然史博物館。例如在一九三三年，震旦博物院正式開放給大眾參觀時，單是植物標本就有五萬多件，而且全部是經過整理、有目錄可循的標本。在這方面，栢永年神父與博物館中另一位專門負責植物部門

---

駐華領事界，一八六一年任駐臺灣，一八七三年退休，一八七七年於倫敦辭世。郇和除了在中國地區進行生物調查，對於臺灣地區的相關研究也極有貢獻，目前相關論著頗多，讀者初步可參考戴勝，〈福爾摩莎大探查——博物學家史溫侯在台的觀測〉，劉克襄策劃，宋文薰等著，《探險家在台灣》（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8），頁 19-26。

<sup>27</sup> Dehergne, "Les débuts d'un naturaliste en Chine," p. 214.

<sup>28</sup> E. Charles Nelson, "Charles Rathouis's painting (1889) of Augustine Henry's Goral from the Yichang Gorges, China,"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21.1 (1994): 43-47.

<sup>29</sup> John David Dignes La Touche,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25-1934), vol. 1, p. 3.

<sup>30</sup> 此處神父們的中文名稱皆是參考學校手冊：震旦大學編，《私立震旦大學一覽》（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5）。

的白于珩神父 (Henri Belval, 1893-1949) 確實功不可沒。<sup>31</sup> 另以鳥禽類為例，該博物館在上海和鄰近地區蒐集的鳥禽類標本收藏十分齊全，因為負責人松梁材神父鼓勵同好除了收集鳥類本身的標本之外，也收集各種鳥巢和鳥蛋的標本。<sup>32</sup> 從這些記錄可看出，博物院在徐家匯的時代就已建立了豐富的收藏。

## (二) 出版與繪圖人才之培訓

除了豐富博物館之標本收藏外，神父們在成果發表上也不遺餘力。如前所述，在一八七四到一八八五年間，韓伯祿神父曾經出版十薄冊有關中國貝殼的書籍。當時的印製出版與發行完全委託給巴黎一家專門印製科學類書籍的出版社 Librairie F. Savy，書中的大量圖版則是請法國自然史學者，本身也是軟體動物學家 Arnould Locard (1841-1904) 繪製。<sup>33</sup> 此研究出版後獲得頗高的評價，所以後來又以合訂本的形式再版發行。不過，在一八七〇年代末，神父們已經著手規劃在徐家匯當地的出版工作。一八八〇年，博物館開始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博物館本身的出版品《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此時整個印刷製作已直接在位於徐家匯的土山灣孤兒院附設印刷工坊中進行——此即後來廣為人知的「土山灣印書館」。這套叢書前後出版了六大冊，其中有許多動物與植物標本的石印圖版。為了出版這些科學研究，博物院的神父在此孤兒院培養了一些當地的年輕學徒來從事生物標本圖的繪製。而這

<sup>31</sup> Frédéric Courtois, "L'herbier de Zikawei: Herborisation dans le Kiangsou en 1918,"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 6.1 (1920): 1-136; 在此出版品中，作者共提供了 1055 種江蘇植物的鑑定成果。此外，白于珩神父也陸續發表相關的鑑定報告：Henri Belval, *Contribution à la flore du Kiangsou*, coll. « Notes de botanique chinoise », n° 1 (Shanghai: Université de l'Aurore and Musée Heude, 1931); Henri Belval, ed., *Flore de la région montagneuse du Ngan-Hoei, énumération des plantes récoltées et déterminées par le P. Courtois au cours des années 1906-1922*, coll. « Notes de botanique chinoise », n° 2 (Shanghai: Université de l'Aurore and Musée Heude, 1933)。白于珩神父為化學博士，在上海期間，曾擔任震旦大學化學系主任（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任此職）。他注重改善實驗室設備，使該系程度可與法國各大學媲美，更讓震旦大學獲教育部批准，於一九三三年成立化工系。見震旦大學校友會主編，《震旦大學建校百年紀念 1903-2002》（上海：震旦大學校友會，2002），頁 45。

<sup>32</sup> Flamet, "Le Musée Heude, ses fondateurs et ses richesses scientifiques," p. 49.

<sup>33</sup> 此位學者在其所繪的圖版上所留之名經常是 Arnoul，而非全名。前所提及的譚衛道神父所出版的《中國鳥禽類》(*Les oiseaux de la Chine*) 中的圖版也是出自他手。

方面的傳授工作是由博物院的一位新進神父蔣其儀 (Charles Rathouis, 1834-1890) 擔任。

蔣其儀神父生於法國南特，於一八六五年進入耶穌會，在此之前，他接受過醫科訓練，且曾在巴黎教會學校中教授自然史。一八七七年底，他來到徐家匯耶穌會總院，在博物院內很快地成為韓伯祿神父的得力助手。由於他擅於使用顯微鏡與解剖刀，又具有標本繪圖的技藝，很快地成為博物院科學出版品的主要繪圖師。《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第一、第二冊的圖版都是由他親手繪製（見圖一）。同時，他也開始訓練一批土山灣孤兒院的年輕學子來從事這方面的繪畫和石印出版。<sup>34</sup> 從第三冊開始，這些年輕畫師所製作的圖版陸續出現，他們或與蔣其儀神父共同掛名，或單獨掛名，大多時候會留下姓名的羅馬拼音，有時也在圖版上留下其中文姓名（見圖二至六）。<sup>35</sup> 一八九〇年蔣神父過世後，大部份的標本圖版就是由這些中國本地畫師來承作。

在技法上，這些圖版與當時西方的博物誌圖版並無二致，而迥異於西畫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東西畫法混合之作——例如時常被提到的郎世寧之宮廷洋畫、蘇州桃花塢年畫，<sup>36</sup> 或出現於廣州口岸的貿易畫。<sup>37</sup> 即使是在討論此類中西交流下所產生的博物學繪畫時最常被提出的例子，<sup>38</sup> 亦即英人 John Reeves (1774-1856) 委託廣州不知名畫師所做的博物學圖畫，<sup>39</sup> 也與我們在土山灣自然史類出版品中

<sup>34</sup> Courtois, "Le P. Heude et le musée de Zi-ka-wei," p. 12.

<sup>35</sup> 目前可辨識出的有宋德林、溫桂生、P. Wang、Yang 等人。

<sup>36</sup> 方豪在其《中西交通史》中已提及蘇州年畫，見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第5冊，第二章〈圖畫〉。

<sup>37</sup> 有關廣州口岸出現的貿易畫之特殊性與地方文化史意涵分析，可參考江滢河，《清代洋畫與廣州口岸》（北京：中華書局，2007）。書中對於自然博物類主題略有提及，見頁 222-226。

<sup>38</sup> Fan Fa-Ti,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書中第二章便是以此為主要討論對象。

<sup>39</sup> John Reeves 在一八〇八年成為英屬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檢查員，一八一二年進入中國地區，直到一八三一年才離開，在華期間曾長期於廣州擔任茶行檢查員。他曾為英國科研機構蒐集大量的中國地區標本，並且請廣州專門製作貿易畫的畫師為他繪製標本圖，數量超過二千幅，他因此被認為是鴉片戰爭之前，在華的英國博物學者中最重要的一位。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線上展覽提供了該館 The John Reeves Collections 收藏系列的許多畫作：<http://www.nhm.ac.uk/nature-online/art-nature-imaging/collections/reeves/index.html>（瀏覽 2011.10.17）。

所見的標本圖版大不相同。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後者所呈現的多是動物頭骨、牙齒剖面，而不只是動物或植物的擬真再現，其執筆者除了需要具備相當程度的素描技法，還要有解剖學知識與顯微鏡觀察能力。此外，這些圖版的科學用途是很明確的，不容易被當作裝飾用的花鳥百獸圖。土山灣的年輕畫師何以能夠繪製這些圖版？為回答此問題，我們必須對這個耶穌會創辦於江南的孤兒院之工藝美術背景加以瞭解。目前論者都認為其中的圖畫間——即後來一般習稱的「土山灣畫館」——為「目前所知最早以學徒方式培養中國西洋畫人才的場所」，並估計有不下百餘名中國孤兒曾在其中接受過素描、水彩、油畫及版畫等訓練。<sup>40</sup>

土山灣孤兒院，最初稱為土山灣育嬰堂，其源頭可溯至一八四九年。<sup>41</sup> 當年江南發生大水災，其後幾年連續有飢荒，同時又發生太平天國之亂，造成大量難民，耶穌會因此設立難民所，收容教內外難民。其中有父母雙亡的年幼兒童，成為孤兒院最早的一批院童。孤兒院最早設於青浦之橫塘，後遷至蔡家灣，但由於該處房舍遭太平軍燒毀，掌院教士被殺，一度又遷至董家渡。至此，由於該院收容人數日多，收養條件惡化，耶穌會神父在徐家匯南端的土山灣地帶購得大片土地後，遂決定興建一座大型新式孤兒院，在一八六四年底將原有院童遷入。孤兒

<sup>40</sup> 見萬青力，《並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紀中國繪畫史》（臺北：雄獅，2005），頁180。萬青力此書部份內容早在一九九二年就開始在《雄獅美術》連載，前後持續兩年，但因種種因素，所有內容遲於二〇〇五年才以完整的面貌出版，其中有關土山灣畫館的研究應是成於一九九〇年代初，可算是較早且較完整者。筆者於此要特別感謝石守謙老師提醒筆者注意此條資料，並慷慨將藏書借予筆者。

<sup>41</sup> 有關此孤兒院的簡史，筆者以早期的法文資料為主要參考依據，尤其是史式微所留下的兩份資料：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Joseph de La Servièr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son histoire, son état présent* (Zi-ka-we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14)。另有一份作者及寫成日期皆不詳的中文文獻亦值得參考，推測是早期法文資料的中譯草稿：〈江南育嬰堂記目錄〉，鐘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第5冊，頁2487-2621。晚近因徐家匯土山灣博物館的籌劃與成立（二〇一〇年六月正式開館），一些以中文撰寫的短文、論文集或學位論文陸續出現，但是其所敘述的內容大多取材於上述資料，而且只是將之譯寫成中文，不同作者之間相互襲用，重複性極高而一手研究極少，以訛傳訛處亦不少。由於此類文章數量頗多，無法一一列舉，此處僅列略有參考價值的幾例：宋浩杰主編，《土山灣記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0）；黃樹林主編，《重拾歷史碎片：土山灣研究資料粹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張曉依，〈土山灣印書館西文資料考述〉，復旦大學歷史系、出版博物館編，《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頁321-337；高蓓，《「土山灣孤兒院美術工場」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論文，2009）。

院此後遂以此地名為名。為了讓逐漸長大的孤兒們有一技之長，也為了減輕孤兒院的經費負擔，院內神父除了提供院童基礎教育之外，還設有工藝作場，培養青少年院童各種技藝。一些工坊在一八五〇年代孤兒院位於蔡家灣時即已設置，雕刻間與圖畫間似是最早設立的工坊之一；遷至土山灣後，工坊規模擴增，陸續又設有皮作間、細木間、粗木間、布鞋間、翻砂間、銅匠間、風琴間、印書間、照相等等等。<sup>42</sup> 由於當時上海天主教堂日漸增多，土山灣工藝院初期以製作教堂日需的宗教用品居多，包括祭台、聖像畫、雕刻、彌撒用之器具等等，而其製作之教堂彩繪玻璃在當時的中國更是獨一無二。土山灣工藝院之技術聲名很快地在當時外國人圈子內傳播開來，其中除了圖畫間受人矚目之外，目前最常受到論者注意的還有其印刷間。土山灣印刷部門在一八七〇年前後設置完成，<sup>43</sup> 初期僅印製傳教書籍，後來則承印大部份教會和法國租界的各類印刷品和書籍，一直到二十世紀上半期，都是上海印刷事業的主力之一，而且在石版印刷及後來的照相印刷等方面領先當地業界。<sup>44</sup> 早在上海尚未出現訓練西畫人才的專門機構之前，土山灣畫館已培養了最早一批中西畫能力兼具的年輕學子。晚近試圖回顧這段歷史的論者最常引用徐悲鴻在一九四三年所發表的〈新藝術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的意見。徐文有言：

至天主教之入中國，上海徐家匯，亦其根據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溝通，該處曾有極珍貴之貢獻。土山灣亦有習畫之所，蓋中國西洋畫之搖籃也。<sup>45</sup>

土山灣的院童在教士的訓練下，學習鉛筆、炭筆、水彩、油畫等技法，以臨摹入手，掌握各個畫種的特色。就目前所知，現在一般較熟悉的月份牌畫師徐咏

<sup>42</sup> 宋浩杰主編，《歷史上的徐家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頁100-127。

<sup>43</sup> 一九二〇年的一份報導載明該年為印刷部門成立後第五十一年，故可推算其成立於一八六九至一八七〇年間：〈土山灣印刷所五旬金慶誌盛〉，《聖教雜誌》1920.6：284-285。

<sup>44</sup> 關於該機構的中文研究一向稀疏零星，晚近隨著中國出版史與書籍史的興盛，目前已有較多著述，但是至今仍缺乏完整可靠的研究。有關該機構印刷事業在上海的重要性，讀者可先參考鄒振環，〈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1-14。另外亦可參考 Joachim Kurtz, “Messenger of the Sacred Heart: Li Wenyu (1840-1911) and the Jesuit Periodical Press in Late Qing Shanghai,” in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ed. Cynthia Brokaw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pp. 81-109. 筆者於此要感謝不具名審查人提醒後面這條參考資料。

<sup>45</sup> 原刊於重慶《時事新報》(1943.03.15)，收入王震、徐伯陽主編，《徐悲鴻藝術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頁427-431，引文見頁428。

清，還有後來自行設立中華美術專門學校的周湘、專精泥塑的張充仁、以黃楊木雕聞名的徐寶慶等人都曾經是土山灣的學徒。<sup>46</sup> 不過，至今的相關研究皆未觸及科學繪圖的部份，筆者只能從這些年輕畫師在圖版上留下的中文姓名得知他們的存在；至於其個別身份和後來的發展，尚待未來進一步查證。

在照相設備尚未普及、照相印刷技術亦未成熟之前，植物或動物圖譜之類的博物學繪圖在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上曾經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可以彌補文字說明之不足，又可以當作採集者或研究者觀察的證據，而且當模式標本遺失、損毀或不可近得時，還可充作鑑定、分類的替代品。好的標本繪圖常常是相關研究者之間交換的複本，同時又像是一種「紙上博物館」，可供遠方的同好研究、鑑賞。<sup>47</sup> 作為一種視覺論據，這類繪圖的製作與出版於十六世紀的西歐開始受到重視而發展，其呈現方式到了十八世紀末已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規則。<sup>48</sup> 中國早期並不重視此種擬真的科學繪圖，然而在本身從事科學工作的外籍神父們的指導下，土山灣青年畫師習得這類圖版製作所需之精確繪圖、刻板、印刷技能，並在十九世紀末徐家匯博物院的出版品中展現了他們的功力。可惜的是，現在討論到中國植物科學繪圖的歷史時，往往以馮澄如（1896-1968）為第一人，<sup>49</sup> 而忽略了早於馮氏作品數十年的土山灣青年畫師之作品。土山灣孤兒之技藝成就被遺忘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而這也是為什麼土山灣工藝工場的历史值得我們於未來做進一步探索。

<sup>46</sup> 吳嘉陵，《清末民初的繪畫教育與畫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6），頁 92-93。

<sup>47</sup> 見 Denis Lamy, “Le dessin botanique dans la transmission des connaissances,” in *Passions botaniques: naturalistes voyageurs au temps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Rennes: Editions Ouest-France, 2008), pp. 139-154. 有關「紙上博物館」的概念，最早可溯至義大利貴族收藏家 Cassiano dal Pozzo (1588-1657) 所規劃的 Museo cartaceo；他委託畫師將其數量龐大的各類收藏品分門別類畫入畫冊，變成容易傳閱的印刷書，此舉大大提高了當時歐洲的文人雅士對古物的研究興趣。

<sup>48</sup> Sachiko Kusakawa, *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 Image, Text and Argu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Human Anatomy and Medical Bota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sup>49</sup> 例如胡宗剛，《靜生生物調查所史稿》（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 49-54；孫英寶、馬屢一、覃海寧，〈中國植物科學畫小史〉，《植物分類學報》46.5 (2008)：772-784。

### （三）與上海博物院的交流

正式成立後的徐家匯博物院除了與當地耶穌會所屬各機構有合作關係之外，跟上海同性質的機構也互有來往。由於此時期由中國人管理、有意識地從事生物標本採集與研究的機構尚未出現——直到一九二二年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才算有所突破<sup>50</sup>——徐家匯博物院早期最常交流來往的當地機構不外乎是前已提及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所建立的博物院，亦即一般所稱的「上海博物院」。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當時簡稱亞洲文會）原先是在華英人於一八五七年自行成立的「上海文理學會」（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其宗旨是調查中華帝國與其周邊國家的各種情況。由於宗旨相同，這個學會在一八五九年決定加盟資深的皇家亞洲文會（一八二三年成立於倫敦），而且因為當時皇家亞洲文會在香港已有一個中國支會（一八四七年成立），遂自名為「北中國支會」，以資區別。<sup>51</sup> 該會的活動主要在於刊行會報、設立圖書館與博物院。文會的博物院是在一八七四年成立，經費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補助，地址在公共租界內的上圓明園路（一八八六年改名為博物院路），也就是北中國支會辦公室與圖書室所在的同一棟兩層樓建築物內。起初規模極小，僅有一間陳列室，在一八八〇年代初，當圖書室因藏書漸多而另遷他址時，博物院才擴增為兩間陳列室。<sup>52</sup>

如前所述，韓伯祿神父於一八七七年時即已應此博物院院長的邀請而開始為之進行標本鑑定。<sup>53</sup> 但兩個博物館之間真正頻繁的交流可能是在英國探險家兼自

---

<sup>50</sup> 這是一個由中國科學社（成立於一九一四年）所籌備設置的私立研究機構。相關研究可參閱：陳勝崑，《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此外，關於中國科學社的研究頗多，目前較完整的論著當為：張劍，《科學社團在近代中國的命運：以中國科學社為中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sup>51</sup> 見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 11-12。王毅此書應是目前有關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最詳細的研究，但其中關於上海博物院的部份篇幅不多，且偶有訛誤，例如在第 168 頁錯指譚衛道神父為該博物院首任館長即為一例。

<sup>52</sup> 見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hina's Natural History: A Guide to the Shanghai Museum (R.A.S.)*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1936), p. 3。此為蘇柯仁為一九三三年改建後的博物院所撰寫的一份藏品導覽。

<sup>53</sup>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9.5 (1933): 219-225。根據此文的描述，韓伯祿是在當時的榮譽院長 J. P. Martin 的邀請下協助鑑定；但根據北支出版的刊物所載之院長年度報告，一八七七年十一月起，

然史學者蘇柯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 進入上海博物院主事之後。蘇柯仁出生於山西太原，其父親是在中國佈道逾四十年的浸禮會教士蘇道味 (Arthur Sowerby)。高曾祖 James Sowerby (1757-1822) 則是英國植物學的奠基者之一，其手繪的英國植物圖譜與礦物圖譜極富盛名；而其曾祖 James de Carle Sowerby (1787-1871) 也是自然史家，並為英國皇家植物學會 (Royal Botanic Society) 的創始人之一。<sup>54</sup> 蘇柯仁在中國度過童年，能說流利中文，後來在英國接受高中與大學教育。他在一九〇五年返華，曾在天津倫敦會創辦的新學書院任教，其後曾參加多次長程探險之旅，並沿途採集標本。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他參加由美國富商 Robert Sterling Clark (1877-1956) 所組織的探險隊，在山西、陝西、甘肅等地進行探勘。此行之後，他出版多本著作，從此奠定他在中國博物學方面的研究興趣和名聲。<sup>55</sup> 他在一九一六年成為文會會員，亦曾於一九一七年前後為徐家匯博物院鑑定大型哺乳類動物標本。<sup>56</sup>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他決定長居上海，並且開始擔任上海博物院名譽院長 (Honorary Curator)<sup>57</sup>

上海博物院的院長已改由任職於海關的法國人福威勒 (Albert Auguste Fauvel, 1851-1909) 擔任。見 Albert A. Fauvel, "Report of the Curator for the Year 1878,"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13 (1879): xiii-xviii。由於福威勒本身也熱衷於中國自然史，我們可以推斷，他對於促進兩個博物院之間的合作，應該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事實上，福威勒發表於《北支會報》的一篇關於揚子鱷的重要文章所附的標本插圖正是由土山灣孤兒院畫館的神父所繪製，見 Albert A. Fauvel, "Alligators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13 (1879): 1-36。而且他自己也曾將標本贈與徐家匯博物院。有關福威勒文章中將漢學與自然史共冶一爐的特色，可從范發迪書中第四章的討論略知一二，見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pp. 115-118。

<sup>54</sup> 蘇柯仁姓名中的法文部份 de Carle 即來自其高曾祖母，James Sowerby 之妻 Anne de Carle，她是一位法國喀爾文教徒之後代。此外，蘇柯仁的祖母 Grace Séguier 是法國當時總理大臣 Pierre Séguier 的女兒，因此蘇柯仁可說是來自一個具有英法雙重背景的家族。其詳細生平可見 Richard Raine Sowerby, *Sowerby of China: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1956)。

<sup>55</sup> 關於此探險旅行，可見 Robert Sterling Clark and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rough Shên-kan: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9* (London: T. F. Unwin, 1912)。Robert Sterling Clark 本身是勝家縫紉機公司創始人之後代，由於當時對於中國充滿好奇，所以出資並籌劃此一探險之旅。在此行之後，他一生未再踏上中國土地，但是其收藏愛好不變，與其妻收藏許多法國印象派畫作。

<sup>56</sup> 他在徐家匯博物院的研究心得曾經發表："Notes on Heude's Bears in the Sikawei Museum, and on the Bears of Palaearctic Eastern Asia," *Journal of Mammalogy* 1.5 (1920): 225。

<sup>57</sup> 由於該博物院院長不支薪，故以名譽院長 (Honorary Curator) 稱之；真正以薪資雇用來管理標本的人員才稱 Curator。一九三二年，蘇柯仁將頭銜從 Honorary Curator 改為 Honorary

的副手，更於一九二七年成為正式的名譽院長，此後一直擔任此職至一九四六年為止。<sup>58</sup> 此外，從一九三五到一九四〇年底，他還同時擔任亞洲文會北支會的會長。在這段期間內，兩個博物館一直維持著良好的交流關係。蘇在自己所創辦的刊物《中國科學美術雜誌》(*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常報導這兩個自然史博物館的活動。<sup>59</sup>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他個人捐贈數百種期刊給當時已改名為震旦博物院的徐家匯博物院圖書館。<sup>60</sup> 這位上海博物院名譽院長在一九四一年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區後淪為俘虜，遭到軟禁。戰後初期，他繼續住在上海，並在震旦博物院做了一些研究，直到一九四六年秋天，他因為健康因素而決定回英國長期休養。雖然亞洲文會當時仍繼續運作，<sup>61</sup> 他在離華前卻選擇將他自己收藏的大量生物標本、古文物和叢書悉數捐贈給震旦博物院，他對此機構的重視與信任由此可見。<sup>62</sup> 震旦博物院也為他所捐贈的藏品另闢一個以他為名的陳列室：The Sowerby Hall。<sup>63</sup>

一九三〇年，徐家匯博物院遷入震旦大學校園內，並改名為震旦博物院；一九三三年，亞洲文會所在的建築物也因遭白蟻蛀蝕而原地改建，上海博物院此時

---

Director。

<sup>58</sup> 其實該博物館在一九四一年就已因戰爭而暫停，到了一九四六年才又勉強恢復運行。除了這些科學活動外，蘇柯仁還是「在華英人居民協會」與「在華外國居民協會」的發起人兼會長，也曾積極參與保護鳥類的運動，見張寧，〈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對抗「鳥類受害者」，1890-19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4 (2000)：89-144。筆者在此要特別感謝張寧教授與我分享她過去搜尋相關資料的心得。

<sup>59</sup> 《中國科學美術雜誌》(*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發行於一九二三至一九四〇年，為一英文刊物，目標是幫助在華的外國人瞭解中國文化，並報導當時進行中的各種科學、藝文、休閒活動。發刊時原為雙月刊，每期有百餘頁，一九二五年起改為月刊，每期約六十頁。一九二七年起，由於原名太長，而將英文名改為 *The China Journal*，但封面中文名稱一直維持原樣，至一九三五年才更改為《中國雜誌》。

<sup>60</sup> V. P., "Le Musée Heude: Un an d'activité scientifiqu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28 (1933-1934): 81.

<sup>61</sup> 文會因戰爭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暫時關閉，於戰後恢復活動，直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完全結束為止。見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頁 27。

<sup>62</sup> Joseph Dehergne, "Le fonds Sowerby,"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rd ser., 24 (1945): 812-815.

<sup>63</sup> Keith Stevens, "Naturalist, Author, Artist, Explorer and Editor and An Almost Forgotten President: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 President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1940,"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38 (1998): 121-136.

才從兩個陳列室擴大為兩層樓。這兩個由西方人經營的博物館之間的交流並未因這些改變而減少，反而比前一時期更加密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兩個博物館陸續被迫關閉，財產遭到充公，而上海市本身的自然博物館於一九五六年籌建時，就是以這兩個博物館的藏品為基礎而開始發展的。<sup>64</sup>

在徐家匯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院交流合作的部份，還有動物標本剝製員培訓問題值得我們注意。上海博物院早在籌備期間即注重未來的陳列與公開展覽，主事者意識到標本製作師的必要，但久覓未得。恰巧譚衛道神父在其中國採獵途中，曾訓練出一名中國助手王樹衡來協助自己採集、整理和製作標本。<sup>65</sup> 在譚神父於一八七四年四月初搭船返法而從此未再訪華後，這位標本製作師被輾轉介紹到成立不久的上海博物院任職。<sup>66</sup> 雖然該博物院初期僅有一間陳列室，但若根據當時《申報》的報導，其展示效果頗佳：<sup>67</sup>

泰西各大城池夙有成例，凡在該地方人，必公建一院，將飛禽走獸以及各動物並列於內，以便博物者隨時賞玩。如在府城，則將闔郡之物實之；如在都城，則將天下之物實之，名曰博物院。現在旅居上海之西商亦仿效泰西規模，在本埠設立一院，將中國與東洋各物齊集聚院中，事雖創始，而所羅列者業已不少。計屬毛蟲者，有震澤湖旁之野豬小鼠等；羽族者，有鷹鵠麻雀等；又有水族中名物，不能殫述。餘如螳螂、蚱蜢、蝴蝶之類亦各分其種，各標其名。每一物件係從何處得來，何人相贈，必書明懸貼於上。中外人有往觀者，俱不取值也。珍藏羽毛各類，西國向有妙法，雖皮已乾枯而毛可不落。現在此法華人已得之。且又從國外購到玻璃眼睛，故無論是何異獸珍禽，一經裝點，變栩栩然大有生氣。

從現有的資料中，我們無從得知王樹衡在該院服務多久，僅知在一八九〇年代初期，上海博物院又面臨欠缺專門管理標本的人員之窘境。根據名譽院長的年

<sup>64</sup> 宋浩杰，《歷史上的徐家匯》，頁156。

<sup>65</sup> 此人名是根據 Sowerby 一文所提供的中文名。胡道靜在為上海通社撰寫的介紹文章中也提到此人，但目前尚無法得知此人的生平。見 Sowerby,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p. 220.

<sup>66</sup> 譚衛道在其出版的中國行旅日記中提到此事，但未有細節描述，見 Armand David, *Journal de mon troisième voyage d'exploration dans l'empire chinois* (Paris: Hachette, 1875), vol. 2, p. 319. 根據高第 (Henri Cordier) 追悼譚神父的文章中所提，王員是由他介紹到文會之博物院工作，見 Henri Cordier, "Armand David," *T'oung Pao* 2.1 (1901): 94-96.

<sup>67</sup> 〈創設博物院〉，《申報》(1875.11.04)，見上海申報館編，《申報影印本：一八七五年七月—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上海：上海書店，1983），第7冊，頁433。

度報告，當時該博物院一度想從澳洲或日本徵求相關專家，但由於經費有限，一直無法覓得理想人才，因此更堅定了應該自行培訓中國當地人才的想法。<sup>68</sup> 一八九七年，博物院又雇用一位周姓助手，但是這方面的人力似乎一直不穩定，<sup>69</sup> 直到一九〇七年事情才出現轉機。

這一年，擔任上海公共租界衛生行政官員 (Health Commissio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的斯坦利 (Arthur Stanley) 接任該博物院名譽院長，這位自然史的業餘愛好者上任後打算對博物館內的藏品進行全盤清點整理。適逢本身也是鳥類學專家的海關官員拉圖許來訪並且加入亞洲文會，<sup>70</sup> 斯坦利於是委託他整理博物院內的鳥類標本並製作相關目錄，後者也在幾年之間為博物院增添了許多新標本。<sup>71</sup> 拉圖許當時帶來自己先前培訓的中國助手唐旺旺 (1886?-1932)，<sup>72</sup> 後者經其推薦，遂成為上海博物院專任的標本剝製師，一直到一九二二年轉往廈門大學服務為止。一九二二年，斯坦利因故離開上海，博物院院長一職由戴維斯 (Noel Davis) 代理，而實際上則是由甫至上海定居的蘇柯仁主事。唐旺旺離職後，蘇柯仁聘用其子唐仁官（又名唐瑞芳）接替遺缺，並加強訓練其標本製作技術，而唐仁官的兩個弟弟唐瑞玉、唐瑞耿則擔任其助手，從旁學習。<sup>73</sup>

<sup>68</sup> H. Vossy-Bourbon, "Honorary Curator's Report,"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27 (1895): 222-223.

<sup>69</sup> 見 Sowerby,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p. 221. 文中提到的是 Mr. S. Chou，但未寫出中文名。

<sup>70</sup> 拉圖許是英國人，其祖先似是法國喀爾文教派信徒，在宗教改革後移民至愛爾蘭定居。他本身出生於法國中部城市 Tours，一八八二年抵達中國，任職於中國海關，直到一九二一年退休返回愛爾蘭為止，一九三五年死於西班牙馬略加附近海域。其生平梗概可見："Obituary: John David Dignes La Touche," *Ibis* 77.4 (1935): 889-890. 他在中國地區駐居將近四十年，曾在各地進行廣泛的生物採集與調查，亦曾於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間來臺做田野調查。這個部份可參考戴勝，〈樹蛙、長毛象、原住民——自然科學家拉圖許的徒步之旅〉，劉克襄，《探險家在台灣》，頁 81-94。

<sup>71</sup> John David Dignes La Touche, "The Collection of Bird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40 (1909): 69-77.

<sup>72</sup>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在網路上提供的簡短資料，將其生卒年標為 1886-1933，見「上海市地情資料庫：唐旺旺」<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429/node4432/node70711/node70715/node70723/userobject1ai54307.html>（瀏覽 2010.01.24）。但根據蘇柯仁當年提供的資料，唐似是出生於一八七〇年前後，見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ang Wang Wang,"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6.2 (1932): 57-59.

<sup>73</sup>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Personnel of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9.5 (1933): 225.

唐氏一家原籍福建，唐旺旺的父親唐春營本在閩江打魚捕獵為生，他有時會把捕獲的鳥禽羽毛整理後賣到城內的洋行，以補貼收入，拉圖許便是經由此管道而與之結識。由於拉圖許非常欣賞唐氏父子的捕獵身手，便於一八九六年進一步雇用他們在野外收集標本，並傳授他們製作標本的技術。自幼隨父親在野外採集打獵的唐旺旺本名唐啟旺，由於拉圖許一直無法正確喊出唐啟旺的名字，唐乾脆讓他喚他旺旺，唐也以此名揚聲於外，所以後來中外文獻皆載此名。拉圖許原為福建海關官員，後輾轉遷調至上海，臨行時鼓勵唐氏父子一同前往，但最後只有唐旺旺與其一位兄弟同行。拉圖許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兩冊《華東鳥類手冊》(*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 China*) 收錄了中國沿海省份七百五十個種和亞種的鳥類，書中所提及的標本有許多即是唐氏父子的採集成果。這位專研中國地區鳥禽的專家因此特別在該書下冊扉頁上附上唐氏一家的照片，讓人得以一睹這些田野工作的無名英雄之真面目。<sup>74</sup> 拉圖許在中國居住期間捐贈了不少標本給上海這兩個由西方人創辦經營的自然史博物館，其中部分標本應是出自唐旺旺之手。唐旺旺於一九三二年初過世時，蘇柯仁特別在《中國科學美術雜誌》發表一篇紀念文，並附上唐之相片。文中提到，唐旺旺一家六兄弟皆成為自然標本採集者，而他的三個兒子也被培訓為標本製作師。<sup>75</sup> 目前可得之零星資料顯示，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於一九二八年成立後，唐家第三代唐善康、唐瑞玉即到此機構擔任標本製作員，同時也被派往不同地區協助採集標本；<sup>76</sup> 中央研究院於一九二九年開始在南京籌備自然歷史博物館後，唐氏家族第三代的唐開品、唐瑞金也曾在此機構服務。<sup>77</sup> 若從唐春營算起，唐家在動物標本製作方面的技藝傳承至今已有五代，家族中亦有人成為生物學教授，而不再只是動物標本剝製師。<sup>78</sup>

整體而言，從徐家匯博物院成立後一直到遷入震旦大學之前，院內神父所做的工作就是大量收集、整理、研究，而其陸續發表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在介殼類

<sup>74</sup> La Touche,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 China*, vol. 2, frontispiece.

<sup>75</sup> 見 Sowerby, “T’ang Wang Wang,” 前引資料。

<sup>76</sup> 見陳勝崑，《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之研究》，頁 215-216；胡宗剛，《靜生生物調查所史稿》，頁 81。

<sup>77</sup> 見國立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研究院職員錄（民國十八年度）》（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1929），頁 29。

<sup>78</sup> 見胡鴻興，〈唐家的鳥：記武漢大學生物系標本室高級工程師唐瑞昌〉，《大自然》1981.2：21-23；吳崢嶸，〈百年“標本唐”〉，《檔案春秋》2007.2：14-18；丘濂，〈標本唐：一個家族的標本製作傳奇〉，《三聯生活週刊》579 (2010)：90-95。

或是蘇皖植物目錄等等，都頗受好評。在國際間對於中國地區物種及其地理分佈十分陌生的情況下，這些出版品成為可靠的參考工具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國本身尚未有任何專門機構從事這類工作，徐家匯博物院在生物標本的收集、收藏與保存上為後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雖然創始人韓伯祿神父因為受到歐洲演化論辯論的衝擊，一度將在華的研究視為有助於介入這些辯論的工具，但是這些並不影響博物院本身的收藏成果與後續研究。到了第二個時期，亦即震旦博物院時期，博物館主事者尋求加強這個博物館的在地性與主體性，<sup>79</sup> 積極與當地學者合作，而這段時間也是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逐漸興起的時期。

### 三・震旦博物院時期 (1930-1952)

一九三〇年，徐家匯博物院遷入震旦大學內，地址是呂班路 223 號 (223 Avenue Dubail)。其中文名稱也在此時改為震旦博物院，但有些中文文獻會依其外文名稱 Musée Heude 而稱之為韓氏紀念博物院。<sup>80</sup> 這個合併案其實已醞釀多年，但實際執行主要是由當時主持博物院的松梁材神父（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擔任該職）以及震旦學院院長桑黼翰神父（Père Lefebvre，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擔任該職）<sup>81</sup> 來完成。併入大學後的博物院不僅開始重視教育功能，也與中國當地學界有更多交流，同時也逐漸展開科普的活動。以下就這三方面分述之。

#### （一）與大學教育結合

震旦大學本身也是耶穌會在華的教育事業之一，其成立背景與蔡元培提倡新學有關。一九〇三年，馬相伯在蔡元培的鼓吹之下出面創辦震旦學院，並與耶穌會合作教學。校名是採用古時印度對中國舊稱，佛經譯為「秦坦」的諧音，加上

---

<sup>79</sup> Auguste Savio, "Le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25 (1931-1932): 1-13. 松梁材神父是博物院遷至震旦大學校內後的第一任院長，在這篇介紹文章中，當他談到該博物館的早期歷史時，對於它與歐洲科研機構的關係，就帶著些許遺憾的語氣。他認為過去歐洲科研機構只把韓伯祿神父所創設的這個博物館當作中國地區的自然史相關標本的供應站，而沒有重視其主體性，言下之意，似乎希望博物院進入新階段後能夠更著力於此。

<sup>80</sup> 見震旦大學，《私立震旦大學一覽》，頁 14。

<sup>81</sup> 該神父的中文名字是參考自震旦大學校友會，《震旦大學建校百年紀念，1903-2002》，頁 38。該校至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改名為震旦大學。

「震」在八卦中表示東方，而「旦」象徵太陽升起，「震旦」因此有中華曙光之意，至於法文及英文校名則分別是 *Aurore* 與 *Aurora*。<sup>82</sup> 據該校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介紹所言，校名「兼取東方光明及前途無量之意」。<sup>83</sup> 校址原在徐家匯土山灣北，初期僅教授哲學、拉丁文、英語、法語，因為馬相伯當時所訂立的校章宗旨是「廣延通儒，培養譯才」；<sup>84</sup> 後因馬相伯與耶穌會派來的教務長不合，在一九〇四年停辦。馬相伯於一九〇五年另創復旦公學（即復旦大學之前身），震旦則由耶穌會接手辦理，由中國籍神父李問漁總理校務。<sup>85</sup> 一九〇八年，震旦遷校址於上海近郊盧家灣呂班路，並興建校舍。遷校後，原本以文科培養翻譯人才的震旦逐漸擴大成一個具備法學院、醫學院和理工學院的大學，<sup>86</sup> 反而沒有一個專門的文學院，而只將原來的哲學與語言訓練改成各學院學生初階必修。學校成立後很快地吸引當地年輕學子申請就讀，學生人數每年倍增，人才濟濟。例如一九〇八年浙江省招考留學生，準備派赴歐美深造，震旦高材生胡文耀、翁文灝、孫文耀皆考取公費赴魯汶大學，一時有「震旦三文」之號。

遷校後的震旦學院全校面積約 103 畝，佔地頗廣，所以到了一九三〇年，徐家匯博物院準備遷入時，學校仍可在校區偏北處興建一座大型院舍。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校方舉行動土典禮，當地許多重要的中外人士皆受邀觀禮，地方報紙也有相關報導。桑黼翰神父在致詞中表示，博物館與震旦大學均將受惠於此案：對於博物館而言，由於標本數量太多，原先在徐家匯的建築物已不敷使用，遷入震旦大學後，新的建築物將是真正為博物館而建造，符合博物館展覽及研究的需求。對於大學而言，新加入的自然史博物館將為學校內原來就有的醫科、理科學生增加實際觀察的經驗，豐富課程內容，由此也將刺激學生進行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本已頗負盛名的博物館將會吸引許多參觀者，未來可提升震旦學院在駐華的國際人士圈子中的知名度。此外，校長亦提到，博物館專門發展

<sup>82</sup> 見震旦大學校友會，《震旦大學建校百年紀念，1903-2002》，頁 41。

<sup>83</sup> 震旦大學，《私立震旦大學一覽》，頁 1。

<sup>84</sup> 見震旦大學校友會，《震旦大學建校百年紀念，1903-2002》，頁 41。

<sup>85</sup> 該校經費初期仍以馬相伯所捐田產租息、中法文化會所撥庚款利息、耶穌會補助、法政府長年補助費為大宗。見李純康，〈上海學校溯源〉，上海通社，《舊上海史料匯編》，下冊，頁 345。

<sup>86</sup> 由於學校鄰近當地兩所醫院（廣慈醫院、安當醫院），醫學院學生有了理論基礎後可以就近到醫院實習，震旦醫學院在舊上海相當有名。見震旦大學校友會，《震旦大學建校百年紀念，1903-2002》，頁 43。

的項目，不論是植物或昆蟲方面，都與農業或公共衛生不無關係，而這正是當時各國積極加強的領域，中國也不例外。震旦大學因此希望在這方面對於中國有所貢獻，並且希望藉此與中國年輕科學家合作，所以博物館的研究室將歡迎他們使用。<sup>87</sup>

於一九三〇年啟動的博物館建造工程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終於完成，新建築物呈曲尺形（即 L 形），有三個樓層，其中規劃標本陳列室有六間、研究室三間、圖書室三間，外加一個植物園。在一份對外介紹學校的手冊中，有關震旦博物院的部份，副標題寫的是：「震旦大學附設自然科學研究所」，內文中也強調，此院「非僅博物陳列之館，且亦研究之所」，<sup>88</sup> 可見主事者對於研究工作的重視始終未變。

這次搬遷也是院方清點收藏，進一步規劃研究方向的好時機。根據院方提供的資料，當時院內所藏的哺乳類動物毛皮約有千張，頭骨數也在一千以上，尚有許多原產於中國的大型哺乳類動物全副骨骼。鳥類的標本則有數千件，約涵蓋了三百屬、一千餘種，多為蘇皖地區原生種，但也不乏其他省份的飛禽。其中較特別的是一整組非常完整的上海地區禽鳥的鳥巢卵，屬於松梁材神父的收集成果，其相關研究曾發表在《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第五冊末篇，當中附有這些標本的照片。在爬蟲類方面，博物院收藏有蛇約三百五十條，涵蓋三十餘種，另有蜥蜴、揚子鱷數條，以及龜鱉千餘頭尚待考定。兩棲類與魚類部份較少，但水陸軟體動物類甚多，西自雲南，東至淞滬，全長江流域的軟體動物皆有收藏，計有一千五百種，其中大部份都經過韓伯祿的考定。此外，昆蟲部份則是該博物院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就積極研究的項目。鄭璧爾神父專門研究膜翅目昆蟲，分析其窩巢、寄生方式，對於其生活型態與本能有許多研究，故當時也接受其他許多機構團體委託的昆蟲鑑定工作。此時期為了各類昆蟲的鑑定工作，震旦博物院也與美國哈佛大學、農業部、英國昆蟲研究所、維也納博物院等等單位的專家建立了互助聯繫網絡。<sup>89</sup> 至於植物方面，博物院所藏標本有五萬餘件，其中三萬餘件、約三千種是屬於蘇皖地區的原生植物。栢永年神父在生前發表了《江蘇植物索

<sup>87</sup> 見 1929-1930 學年度大事記：“Chronique du 2<sup>e</sup> semestre 1930,”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21 (1930): 91-95。該報導也提及，在此正式動土典禮前，其實已經開工一段時間。

<sup>88</sup> 見震旦大學，《私立震旦大學一覽》，頁 195。

<sup>89</sup> 見上海市檔案館有關震旦大學一卷之檔案目錄。因部分早期製作的微捲內容十分模糊，無法辨識，筆者至今尚未能建立這部分的詳細資料。

引》，後來白于珩神父整理其遺稿而完成《安徽植物索引》，將長江下游所產的植物盡收其中。此時期由於經營更加穩定，震旦博物院也接受不少標本贈與，例如在植物的部份，就有南京中央研究院所贈的蔣英採集之貴州山林植物百種。<sup>90</sup>

在研究之外，當時在博物院主事的神父們大多也在大學內擔任生物科教師；同時，正如校長所言，學校的教職員也可以幫忙管理博物院，使得博物院的人手不至於像前一時期那樣窘迫。總之，前後任院長松梁材、鄭璧爾神父，還有曾經專管昆蟲部門與動物部門的白納多神父 (Bernard Becquart)、專管鳥類部門的蒲君南神父 (Albert Bourgeois)，以及後來專管植物部的王興義神父 (Jacques Roi) 都同時兼任教職。根據鄭璧爾神父所言，由於松梁材神父可以用中文來教授昆蟲學，他不只在震旦大學擔任教職，也有上海其他學校聘請他擔任此課程。<sup>91</sup>

由這些記錄可以看出，博物館遷入震旦大學後，成為大學設施的一部份，有了更穩定的發展，對大學名聲也有幫助，一如校長在合併之初所期望的。蘇柯仁在其所主辦的雜誌內持續報導當地科學新動態，他更曾在一九三五年的一篇短訊中讚美震旦博物院是當時中國收藏最廣、基礎最穩固的博物館。<sup>92</sup>

一九三九年，震旦博物院慶祝成立七十週年，當時的院長鄭璧爾神父在致詞中指出該博物院的三大任務：第一個任務屬於科學調查層次，也就是對於中國自然史的各方面，尤其是動物、植物盡可能地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與保存；第二個任務是與中國當地以及全世界相關的科學機構交流；第三個任務則是幫助中國本地的青年在智識上和精神上的提升。這個博物院本身並不算是教學機構，但是他希望它在中國青年學生之間，能夠扮演類似法國的自然史博物館或法國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sup>93</sup> 的角色，也就是在自然史領域裏成為一個高等研究的專門機

<sup>90</sup> 蔣英 (1898-1982) 於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間擔任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標本室主任，並負責雲南、貴州、廣西、江西、湖南等地的植物調查工作。

<sup>91</sup> Octave Piel, "Le Révérend Père A. Savio, S.J. (1882-1935),"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entomologique de France* 105 (1936): 6.

<sup>92</sup>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Naturalists' Club of Shanghai,"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23.6 (1935): 395. 此段評論被引用於震旦博物院院長一九三五年的活動報告，見 Octave Piel, "Activité du Musée Heude pendant l'année 1935,"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33 (1935-1936): 12-13.

<sup>93</sup> 有關 Collège de France 之中文譯名，目前學界並未有固定譯法，雖有部分文章將之譯為「法蘭西學院」，但此譯名極易造成此機構與另一機構 Académie française 之混淆。有鑑於兩個機構的角色與功能相當不同，而「法蘭西學院」是比較貼近後者的譯法，筆者因此決定將 Collège de France 譯為「法國學院」，以資區別。

構，促進相關知識的探索和思考。<sup>94</sup>

從搬遷至新址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成績看來，震旦博物院確實達到當時院長的理想。尤其它與中國當時重要的科學機構或團體，例如中國科學社、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等等都有長期的往來。在博物院慶祝成立七十週年時所留下的相關照片中，我們可看到中國科學社和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都贈送了賀幛，上面分別寫著「文化之光」、「科學先鋒」等頌詞，被主事神父們佈置在二樓陳列室入口處明顯的位置（見圖七）。<sup>95</sup> 這多少也顯示出當地的科研機構對震旦博物院的評價。

## （二）與當地科研人才交流

在徐家匯博物院成立初期，中國本身的自然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機制尚未建立，相關研究團體因此也不多；到了震旦博物院的時期，這樣的情況已有改觀。震旦博物院因此與當地科研人才有較多的交流，這點主要從博物院的藏品研究和出版品中可以觀察到。

在成果發表方面，新的博物院捨棄原來出刊間距較長、開本偏大的《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之出版方式，改以小開本、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將合作學者在各領域整理的成果陸續在數個叢刊中刊出。此外，出版發表所用的語言也從過去完全使用法文的情況，改成英、法文兼容。這時期博物院主要的出版品分別是：*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中國昆蟲學論叢）、*Notes de Botanique chinoise*（中國植物學論叢）、*Notes de Malacologie chinoise*（中國軟體動物學論叢）等等。<sup>96</sup>

從這些出版品的各類內容比重可看出，早期博物院的神父們以研究貝類、哺乳類動物以及植物為主，到了一九二〇年代，研究重心逐漸轉向昆蟲研究。在一九三〇年代以後的出版品中，昆蟲研究則穩佔多數。這樣的轉移一方面反映了各

---

<sup>94</sup> Octave Piel, "Le 70<sup>e</sup>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39 (1938-1939): 56-59.

<sup>95</sup> 見 Flamet, "Le Musée Heude, ses fondateurs et ses richesses scientifiques," 文中所附相片。

<sup>96</sup> 這些刊物主要以法文發行，但兼收英文文章。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五〇年間，《中國昆蟲學論叢》前後共出版十二冊，《中國植物學論叢》共九冊，《中國軟體動物學論叢》共六冊，另有零星的中國鳥類學、中國介殼類數冊。目前在臺灣圖書館不易找到這些刊物，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總館的收藏則相當齊全。至於這些刊物的中文名稱，主要是參考震旦大學，《私立震旦大學一覽》。

時期主持的神父們本身專長的不同，<sup>97</sup> 另一方面也與當時中國的生物學發展和農業發展需求有密切關係。由於對稻、棉、桑、果等方面害蟲的研究與防治的需求日趨迫切，加上當時中國昆蟲分類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拓展，從一九二〇年代中葉開始，與昆蟲學研究有關的機構在中國陸續出現，例如為了全面整治棉害而成立的第一個害蟲防治機構江蘇昆蟲局（1922）、專門統籌全國植物病蟲害防治工作的中央農業實驗所（1933）皆屬此列。另外，中國科學社先後在南京設置的生物研究所（1922）與在北平設置的靜生生物調查所（1928）、<sup>98</sup> 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1934）<sup>99</sup> 等等，也都投入不少人力從事昆蟲研究。<sup>100</sup> 無論是在基礎研究或應用方面，中國昆蟲學在一九三〇年代達到第一次研究高峰。相關研究需要大量的標本為依據，而在這方面，震旦博物院以及亦由法國耶穌會士建立的天津北疆博物院由於成立時間早，累積標本數量遠較其他機構多，而提供給學者許多研究上的便利。<sup>101</sup> 以震旦博物院為例，在昆蟲類方面，一開始即已擁有的標本大約有七萬個；從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七年，每年平均增加兩萬到兩萬五千個標本。<sup>102</sup> 擔任昆蟲部主任的白納多神父在一九四〇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當時館內經過整理編號的昆蟲標本有四十萬件，其中有六百種是新發現的品種。由此可見神父們在比對、分類研究等工作上所下的功夫。該文還提到，儘管時局艱困，該博物館與合作的中國學者汪仲毅仍然繼續補齊汪氏先前所建立的中國昆蟲資料檔案以及書目索引，並將之翻譯出版，為中國與國際昆蟲學界提供了難得的研究工具。<sup>103</sup>

事實上，這個時期的博物院亦積極與各國學者合作鑑定其收藏的標本，並將成果發表在該院出版的期刊中，其中以《中國昆蟲學論叢》的成果最為顯著。從一九二九到一九四八年，該系列共出版十二冊，文章大多以法文或英文寫成；曾經在該刊物發表的四十多位作者中，中國籍的昆蟲學學者就有十多位，除了前已

<sup>97</sup> 松梁材和鄭璧爾神父的專長即是昆蟲研究，他們兩位皆是法國昆蟲學會的會員。其涉獵範圍先是以蘇、皖二省為主，次漸及於舟山群島與廣東之一部分，然後才推至閩、浙等省。

<sup>98</sup> 有關此機構沿革，可參考胡宗剛，《靜生生物調查所史稿》。

<sup>99</sup> 其前身為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於一九二九年一月開始籌備，一九三〇年一月正式成立，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改制為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

<sup>100</sup> 見王思明、周堯，《中國近代昆蟲學史（1840-1949）》（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頁 64-76。

<sup>101</sup> 見王思明、周堯，《中國近代昆蟲學史（1840-1949）》，頁 119。

<sup>102</sup> Piel, “Le 70<sup>e</sup>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eude.”

<sup>103</sup> B. Becquart, “L’entomologie au laboratoire du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rd ser., 3 (1940): 308-312.

提及的汪仲毅，<sup>104</sup> 還有陳世驥、<sup>105</sup> 劉君諤、<sup>106</sup> 劉崇樂、<sup>107</sup> 陸近仁、<sup>108</sup> 馬駿超、<sup>109</sup> 楊惟義、<sup>110</sup> 張光朔、<sup>111</sup> 黃修明、<sup>112</sup> 陶家駒<sup>113</sup> 等等。此外還有多位日籍

- 
- <sup>104</sup> 汪仲毅為浙江大學農學士，曾在浙江省立植物病蟲害防治所工作，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文昆蟲學著述彙錄》，又在一九三五年於《中華農學會報》上發表〈中國昆蟲學文獻索引〉。他在震旦博物院的《中國昆蟲學論叢》中的發表乃原有基礎之擴充，並以中法文對照的形式出版，見 Chung-nie Wang, “Index bibliographique sur l’entomologie chinois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7.10 (1940): 205-462.
- <sup>105</sup> 陳世驥 (1905-1988) 於一九二八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一九三四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當時為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員，在該叢刊發表有：Sicien H. Chen, “Catalogue des Chrysomelinae de la Chine, de l’Indochine et du Japon,”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3.5 (1936); “Etude sur les diptères conopides de la Chin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6.10 (1939); “Galerucinae nouveaux de la faune chinois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9.3 (1942).
- <sup>106</sup> 劉君諤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曾服務於浙江省昆蟲局，專任「桑蛀蟲」之生活史及防治法之研究，被認為是中國樹木蛀蟲研究之始。其後她在震旦博物院做過短期研究，得到院長鄭璧爾神父提供的許多協助，因此她在該院刊物發表研究成果，見 K. O. V. Lieu, “Study of a new Species of Chinese Mulberry-Borer: *Paradoxecia pieli*,”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2.10 (1935); “The Study of Wood Borers in China,”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11.2 (1947).
- <sup>107</sup> 劉崇樂 (1901-1969) 當時為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在該叢刊發表有關胡蜂科的研究：C. L. Liu, “Revisional Studies of the Vespidae of China I: The Genus *Pareumenes* Saussure, with Descriptions of Six New Species,”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8.6 (1941).
- <sup>108</sup> 陸近仁 (1904-1966) 當時在昆明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和國立清華大學農學院昆蟲學系任教，為昆蟲型態學及鱗翅目專家。他在該叢刊發表有：Chin-Jen Luh, “Note on the Presence of Ocellar Sutures on Butterfly Larva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9.1 (1942).
- <sup>109</sup> 馬駿超 (1910-1992) 畢業於上海南洋中學，曾短期在震旦博物院工作，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間在福建工作，先後研究過茶樹害蟲、水稻害蟲等等，一九四六年後到臺灣農業試驗所任職。他在該叢刊發表有：Tsing-Chao Maa, “On the Nomenclature of Certain Xylocopa-Species (Hymenoptera),”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7.6 (1940);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 Some Chinese and Japanese Urostylidae (Hemiptera: Heteroptera),”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11.3 (1947); “On Some Eastern Asiatic Species of the Genus *Psithyrus* Lepel,”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12.3 (1948).
- <sup>110</sup> 楊惟義 (1897-1972) 曾在江蘇昆蟲局工作，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留學法國，後服務於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在該叢刊發表有：We-I Yang, “Genre nouveau et espèce nouvelle de la famille des pentatomida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5.4 (1938).
- <sup>111</sup> 張光朔當時在聖約翰大學生物科任教，專研蝗蟲分類，在該叢刊發表有：K. S. Francis Chang, “Index of Chinese Tettigoniida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2.3 (1935); “Some New Acrididae from Szechwan and Szechwan-Tibetan border (orthoptera: acridida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4.1 (1937); “The Groupe *Podisma* from China (Acrididae, Orthoptera),”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7.2 (1940).

學者和歐美學者，他們或在中國當地任教，或在自己的國家從事與中國地區有關的昆蟲研究，由於都曾經受益於震旦博物院的標本收藏，所以將研究成果發表於該院刊物。這個刊物曾被列為當時中國昆蟲學領域的五個主要學術刊物之一。<sup>114</sup> 它也是其中最長壽的：不但其創刊日期早於其他四個，而且當其他刊物或因經費問題或因為戰亂而陸續停刊後，它仍持續發行，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劃上句點。

除了這份昆蟲學領域的刊物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中國軟體動物學論叢》。此刊雖然在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五年間僅出版了六薄冊的鑑定報告，且主要以震旦博物院的藏品為研究對象，但主要作者包括中國科學社創辦人之一、當時在中國生物學界極負盛名的秉志（1886-1965），以及該領域的年輕學者，如當時任職於靜生生物調查所的閻敦建，<sup>115</sup> 他們的發表對於中國沿海腹足類動物之認識尤有貢獻。事實上，秉志與震旦博物院之淵源尚不止於此。根據當時震旦大學院長（recteur）才爾孟（Père Germain，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六年任此職）所留下的資料，秉志曾主持一「中國藥物研究社」，長期在該校實驗室工作，並指導研究人員，在戰爭期間亦然，直到日軍侵佔校舍後始遷出，時間應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間。<sup>116</sup> 另根據其後人的說法，一九三七年南京淪陷後，南京中央大學全校搬遷至重慶，原服務於該校的秉志卻因妻子重病臥床而不得不繼續留在上海。日人積極

<sup>112</sup> 黃修明的研究專長是鱗翅目灰蝶科，他在該叢刊的發表也與此主題有關：S. M. Yekfa Huang, "The Chinese Lycaenida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10.3 (1943).

<sup>113</sup> 陶家駒（1911-1999）畢業於江蘇農業學校，後在浙江省植物病蟲害防治所受訓，並在多所學校擔任過助教，一九四六年之後到臺灣農業試驗所任職，他在該叢刊發表有：Chia-Chu Tao,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Aphids from West China,"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11.5 (1947).

<sup>114</sup> 見王思明、周堯，《中國近代昆蟲學史（1840-1949）》，頁 133。該書作者所列的其他四種刊物分別是《浙江昆蟲局年鑑》（1931-1936）、《靜生生物調查所學報》（1931-1941）、《昆蟲與植病》（1933-1937）、《趣味的昆蟲》（1935-1938）。

<sup>115</sup> 該叢刊的第一冊刊登的便是這兩位作者的研究報告，閻敦建的部份有："Notes on Protoconchs and Conchs of Some Marine Gastropods"; "Notes on Some Marine Gastropods of Pei-hai and Wei-chow Island"; "Additional Notes on Marine Gastropods of Pei-hai and Wei-chow Island"; "Notes on Some Freshwater Pulmonata in China"; 秉志則發表了 "On Some New Gastropods from Anhui."

<sup>116</sup> 才爾孟，〈抗戰期間之震旦——對後方同學之簡略報告〉，頁 4（發表處不詳）。筆者於上海市檔案館有關震旦大學之檔案中見此文全文印刷版之微捲影像，但該筆資料未標注出處。目前存於上海市檔案館的這批資料，由於缺乏系統性的整理，對於研究者而言，並不容易使用。

戴麗娟

尋求這位知名學者的合作，而他為了不被敵人利用，遂改名易容，隱居躲避。在這段期間，他就是以震旦大學實驗室及博物館為藏身之所，並於該處繼續從事研究。<sup>117</sup>

除了有發表研究成果的功能之外，這些出版品也在震旦博物院的國際科學交流網絡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由於廣泛的出版品交換和訂閱，當時在震旦博物院內可查閱到的自然科學類圖書與期刊相當豐富。例如在為慶祝博物院成立七十週年而舉辦的展覽中，僅僅一個展覽桌就擺放了九十四種經由交換或訂購而取得的刊物，除了中國本地出版的中外文刊物，還有來自所有歐美主要國家、印度、日本、雅加達的外國期刊。以一個純粹由教會經費支持、教士經營的科學機構而言，這樣的成果不容小覷。

### （三）善盡科普功能

在專門研究與教學之外，震旦博物院在科普方面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一九三三年，遷入新建築後的博物院在內部全部佈置完畢後終於對外開放。由於建築為曲尺形，內部分成兩個部份。根據校長在奠基典禮時的說明，<sup>118</sup> 建築物臨呂班路的部份為普通館，採開放制，供一般民眾自由參觀；臨東南方的部分則面對校園，此部分規劃為實驗室、圖書館及各種標本室，保留給研究者使用，只對在校生、校友以及自然科學的專業從事者開放。在提供一般民眾參觀的部份，第一陳列室的地面層主要陳列的是古文物，這些是從土山灣孤兒院轉移歸併到震旦博物院的一批藏品，數量約有三千五百件。<sup>119</sup> 第二陳列室在二樓，專放動物標本；第三陳列室在三樓，以植物標本為主。在第二陳列室入口處，左右分別懸掛「韓司

---

<sup>117</sup> 見翟啟慧、胡宗剛主編，《秉志文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一卷，頁17。

<sup>118</sup> 〈震旦大學新建博物院行奠基禮誌盛〉，《聖教雜誌》19.6(1930)：285。

<sup>119</sup> 這批古文物主要是由土山灣孤兒院附設工藝工場木工部的主任葛承亮修士 (Aloysius Beck, 1854-1931) 因其個人愛好與工作需求而收集的藏品。葛修士為德籍耶穌會士，於一八九二年抵華，翌年就被委任管理土山灣工藝工場木工部。他所訓練的孤兒院院童的工藝精湛，作品曾在一九〇〇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得獎。之後，他陸續帶領院童製作大型中國牌樓、寶塔等作品，在多次博覽會場合中大放異彩。晚近上海因籌辦世博會而將土山灣相關文物匯集，於二〇一〇年六月成立了土山灣博物館，並且將原本散佚於海外的這批早期木雕作品中的幾件重新修復，放置於新博物館中。見宋浩杰，《土山灣記憶》，第一部份。有關葛修士之生平概略，可見繆思，〈土山灣木工部主任——葛承亮〉，《土山灣》13 (2011)：34。筆者於此要特別感謝邱澎生教授慷慨提供這份土山灣博物館所出版之刊物。

鐸遊獵區域圖」和「本院物品出產地區圖」，俾使參觀者瞭解博物館研究人員已考察地區以及尚待考察地區。根據胡道靜的報導，當時每週日、一、三、四、五、六的下午二時至五時開放，入門費每次國幣二十分，三個陳列室都開放自由參觀。另有植物及昆蟲標本約有一千餘箱，則專供學者研究之用，不開放展覽，只有需要研究者才可申請入內。<sup>120</sup>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震旦博物院正式對外開放，受到各界矚目。許多教會的報刊均報導此事；蘇柯仁在《中國科學美術雜誌》中當然也撰文介紹，宣揚此博物館之重要性。<sup>121</sup> 根據博物院本身的年度報告，在這開放參觀的第一年，博物館曾接待的參觀次數共計 2,588（含個人與團體）。其中有學生團體，有博物學者，也有古物愛好者。包括聖約翰大學、上海科學社、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中國科學社的生物研究所等機構皆曾經有人員前來參觀。位於北平的中國地質調查所也派人前來從事動物頭骨的比較研究。<sup>122</sup> 另外也有預備在中國其他省份進行田野調查的外國學者，在行前先到此博物館瀏覽該館已經收集的標本。由於一九三〇年代的兩位院長都以昆蟲研究著名，嶺南、山東、燕京等幾所大學曾經寄送昆蟲類標本來請求協助鑑定。

除了專業的團體或人士之外，一般大眾對這個博物院的認識程度如何？例如，它每年平均吸引多少人次參觀？目前筆者尚未尋得可供整體評估的資料，但至少有一項較明確的記錄可讓我們大致瞭解該博物院與上海當地市民社會的關係：一是該院較具規模的特展所留下的記錄，另一是有關藏品捐贈者的記載。

在特展部分，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院在一九三九年所舉辦的七十週年慶祝特展，上海許多報紙如《申報》等等都給予相當篇幅的報導。此活動開幕時還啟用了一個新的展覽室，並於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五日對一般民眾免費開放，據說在兩週內就吸引七萬多人前來參觀。<sup>123</sup> 為了這次的活動，院方在主要展覽室陳列了韓神父曾考察過的十九個區域之詳細地圖、筆記、相關科學著作與標本。而展覽室四周也分門別類地展示其他神父的標本收集，其中的昆蟲類部分除了展示築

<sup>120</sup> 胡道靜，〈震旦博物院史略〉，頁 382。

<sup>121</sup>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Sociétés and Institutions: the Heude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9.1 (1933): 48-50.

<sup>122</sup> V. P., "Le Musée Heude: Un an d'activité scientifique," p. 79.

<sup>123</sup> 為了宣傳這個七十週年慶祝活動，平日與博物院多有合作的震旦大學醫學院院長富萊梅神父 (R. P. Flamet) 在上海文藝廣播節目中邀請大眾前往參觀。見 Flamet, "Le Musée Heude, ses fondateurs et ses richesses scientifiques."

巢及寄生現象之外，還有膜翅目昆蟲之單性生殖機制的說明——最後這項正是當時的院長鄭璧爾之專門研究領域。另外，昆蟲實驗室除了陳列描繪儀器之外，現場還有捕蟲技巧的表演，並設有孵卵器，參觀者因而可看到蝴蝶新生即翩翩飛舞的景象。脊椎動物陳列室則展出鱷魚全副骨骼。除此之外，參觀者還可進入化驗室和圖書室，其中安排一些陳列品以輔助說明各室在研究上扮演的功能，例如在圖書室中選定某些書籍中之特殊圖案、分類法關鍵以及新發明之描寫，將頁面攤開展示。

至於參觀群眾的反應，院方所提供的一份報導描述如下：

其中不乏有一部份為好奇心所驅使而來者，惟此種觀眾於任何展覽會中皆有之。其他有教師領導一班學生如同上實習課然。尚有一部份參觀者頗為細心視察各個櫥窗內之陳列品並作筆記，次日復來校對者頗有人在。更有人詢問捕蟲法及標本製法，如某一青年學子從觀眾中向吾等詢問製蝴蝶之藥液配製處方者。總之，一般觀眾參觀以後均自認增加知識良多，此為吾人所堪告慰者。<sup>124</sup>

主事者在此文中也表示這些回響促使他們更進一步思考科普的工作，例如可以在研究工作之外，「再添設一指導工作部以培植同好者」。由此可見，博物院主事者本身已經逐漸意識到一個科學性博物館在當地社會可以扮演的角色。

該院另一次特別受到媒體關注的展覽是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五月間舉行的「中國藥物展覽會」。該展覽是由在博物院工作的植物學博士王興義神父和震旦大學吳雲瑞教授共同策劃，主要是陳列《本草》所載的各種動、植、礦物標本，以及製藥用品等等，另外也安排中國醫藥書籍同時展示。<sup>125</sup> 除了靜態展覽外，主辦單位還安排專家配合展覽進行演講，<sup>126</sup> 整個活動受到《申報》相當篇幅的報導。<sup>127</sup>

<sup>124</sup> 〈韓氏博物院七十週年紀念〉，《震旦醫刊》4.4 (1939)：324-329，引文在頁 329。《震旦醫刊》(*Bulletin Médical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原屬於《震旦雜誌》的一部份，但因篇幅愈來愈長，後遂另行刊印，成為獨立刊物。此刊全部中法文對照，此處引用之報導文章亦然，筆者因此直接引用中文部份。

<sup>125</sup> 見王興義、吳雲瑞，〈中國藥物展覽會之概況〉，《震旦醫刊》7.2-3 (1942)：147-161。王興義本身是耶穌會神父，也是植物學博士，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抵華後，原本在天津北疆博物院服務，後調到震旦博物院擔任植物部主任，當時他專門進行中國藥用植物的研究。吳雲瑞醫師本身是生理學家、藥理學家，當時也是震旦大學教授，他曾與其助教一起研究仙鶴草素，證明其有止血強心功能。

<sup>126</sup> 根據報紙報導所整理出的演講有以下幾場：四月十六日（週四）國產藥品對於動物心臟作用之實驗；四月十八日（週六）醫史專家王吉民醫師演講：本草綱目外譯之考據；四月二

此展覽除週二之外，每日下午一時半至五時開放，據說在第一週即吸引上萬人參觀。

從這兩個展覽所留下的報導可看出，與在徐家匯的時期相較，一九三〇年代後期震旦博物院的人員已有較多的心力與時間來與一般大眾進行交流活動，而不再僅限於研究室的工作。除了這類特殊時機的活動記錄之外，我們從有關捐贈者的零星記錄也可看出自然科學概念之普及。震旦博物院與其他博物館一樣，都希望能持續擴大館藏；除了自行採集、籌資購買之外，收藏家的捐贈亦是重要來源。由於其聲望和穩定性，這個博物院陸續吸引了許多重要收藏家之捐贈。除了先前提及的蘇柯仁之外，另外較值得一提的有上海法國總領事館參贊 (chancelier a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Shanghai) Charles Gayot 致贈的一組上海禽鳥標本，其中包括 143 屬、226 種，這是關於上海當地禽鳥最齊全的一份收藏。<sup>128</sup> 此外，海關官員 Oliver 也贈送了一套包含 900 種植物標本的收藏。<sup>129</sup> 與栢永年神父有長久交誼的拉圖許也陸續捐贈了一些標本，包括他在秦皇島捕獲的一批魚類標本。這些博物愛好者的捐贈算是常態；較特別的是在一九四五年，該博物院也獲得上海灘傳奇人物杜月笙 (1888-1951) 捐贈的駱駝鹿 (*Cervus cameloides*) 鹿角一對。根據時任《震旦雜誌》(*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主筆之一的榮振華神父 (Joseph Dehergne, 1903-1990) 的說明，這是一份非常罕有的標本。此動物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由譚衛道神父在中國採集，並交由法國知名動物學者 Alphonse

---

十四日(週五)藥理實驗第二次表演：用甦生之免心證明幾種國藥之作用(此活動據稱吸引二百多人到場)；四月二十五日(週六)巴斯德研究院細菌部主任劉永純演講：巴斯德研究院對於中國藥物之關係；五月二日(週六)吳雲瑞演講：關於研究國藥之芻見；五月十日(週日)醫藥專家黃勝白博士演講：李時珍的聲類學。

<sup>127</sup> 見《申報》於以下日期之報導：1942.04.10, 1942.04.11, 1942.04.13, 1942.04.14, 1942.04.18, 1942.04.24, 1942.04.30, 1942.05.04。根據該報之報導，這個展覽得到各學術團體及數家大藥號支持，包括：中法大學藥學專科、中華醫史學會、中西醫學研究社、上海雷士德研究院等。另外有知名的國藥號如王大吉、宏仁堂、葉樹德、普太和堂都出借國藥標本給展覽之主辦單位。

<sup>128</sup> Savio, "Le Musée Heude," p. 9.

<sup>129</sup> 此人疑為歐禮斐 (Charles Henry Oliver, 1857-?)，愛爾蘭人，傳教醫師德貞之婿，一八七九年入中國海關，在北京同文館任英文教習。一八九五年繼丁建良為總教習，改授物理。一九〇二年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後，歐氏回海關任寧波副稅務司，後歷任南京、蘇州、牛庄、奉天等地副稅務司和稅務司，且一度為北京海關總稅務司署管理漢文案稅務司。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363。

Milne-Edwards 鑑定，屬於逐漸消失的物種，當時世上類似標本已經罕見。<sup>130</sup> 可惜該短文中並未說明杜月笙捐贈的詳細經過。

從一九三〇年代博物院的发展看來，主事者的理想正逐步實現中；無奈戰事打亂了一切規劃，博物院此時只有靜觀其變。戰爭結束後，震旦大學似乎企圖延續原有的博物院計畫。在鄭璧爾神父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過世後，<sup>131</sup> 校長又商請原本在法屬印度支那工作、本身也是昆蟲學專家的外方傳教會神父奉太白 (Albert de Cooman, 1880-1967) 前來擔任昆蟲部主任的工作，<sup>132</sup> 院長一職則由原本擔任代理的蒲君南神父真除。蒲神父在一九四八年因病過世後，院長由奉太白接任。不過，到了一九五二年，大部份的外籍神父被迫離開中國，震旦博物院無以為繼，終於在這一年結束長達八十三年歷史，而其收藏也被執政當局接收，並分配到不同的科研機構。例如成立於一九五〇年的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進化與系統學研究中心暨動物標本館就接收了來自震旦博物院、北平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 (1929-1949)、中國科學社的靜生生物調查所 (1928-1949)、中央研究院自然史博物館 (1930-1950)、故宮博物院等機構收藏的大量動物標本。<sup>133</sup> 另外，如前所述，籌建於一九五六年的上海自然博物館也接收了大部份震旦博物院與亞洲文會上海博物院的藏品。至於博物院裏原本陳列在一樓的古文物收藏則被納入一九五〇年開始籌建的上海博物館。而大部份的圖書和儀器設備，則由上海交通大學接收。<sup>134</sup>

---

<sup>130</sup> Joseph Dehergne and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hronique du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rd ser., 28 (1946): 678-680.

<sup>131</sup> Anon, "A la mémoire du Père Piel, directeur du Musée Heude (1935-1945),"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11 (1947): v-vi.

<sup>132</sup> Albert de Cooman 生於比利時，一八九八年加入外方傳教會，一九〇二年被派往法屬印度支那，從此在當地度過三十九年的歲月。傳教之外，他也熱衷於昆蟲研究工作，於一九二三年成為法國昆蟲學會的會員，並且為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收集了許多蝴蝶與其他昆蟲標本。他轉赴震旦博物院工作前，已經在《中國昆蟲學論叢》發表過多篇研究報告。他於一九五一年返回法國，從此在法國度過餘生。相關資料可見外方傳教會網站："Albert Joseph Marie de Cooman,"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Archives*, <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de-cooman-1> (瀏覽 2013.02.02)。

<sup>133</sup> 宋浩杰，《歷史上的徐家匯》，頁 156。

<sup>134</sup> 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為創建於一八九六年的南洋公學，後曾更名為南洋大學、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一九二一年正式改為交通大學（以交通部原有的四所學校為基礎）。交通大學上海部份在八一三事變後，將許多重要圖書與儀器設備移至法租界，並於一九三七年底商租震旦大學新校舍一部份作為學生上課之用。孤島時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

震旦大學本身則在一九五一年即遭到接收，學校主管改由中國籍人士繼續擔任，但外籍神父於一九五二年仍被迫離華。一九五二年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震旦大學醫學院、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和同德醫學院在此時被合併為上海第二醫學院，新校校地就在震旦大學原址。其他科系也分別與當地各校相關科系合併，至此，震旦大學正式走入歷史。

#### 四・結語

整體而言，這個自然史博物館雖然完全是由法國耶穌會士主導經營，但是在其八十多年的歷史中，不論是在標本收藏、整理、鑑定，或是在成果發表交流上，乃至於對中國當地自然史的基礎研究和興趣啟發等方面，都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在第一個時期，中國學人本身尚無生物標本之系統性採集與研究的基礎訓練，而這個博物院已經逐漸累積了大量生物標本，並且與當時在華的歐美人士進行交流，在某種程度上也刺激了在華外籍人士對於中國生態的興趣。此時的博物院雖然還不是一個保存、研究、展示、教育功能兼具的全方位博物館，但是在上海當地確實扮演了一個研究中心的角色，一如十九世紀在歐洲的許多博物館。從其成果發表方面來看，在博物院的出版品中，我們看到幾位中國青年畫師在神父的指導下所表現出的科學標本繪圖技巧。較之現在一般論述中較常提到的民國時期科學書刊，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這批包含科學繪圖的書籍所出現的年代早了至少三十年，而且充分表現出西方科學繪畫引進與傳承的軌跡。而在法籍神父與上海博物院往來合作的過程中，還無意中培訓了一批動物標本製作師，雖然其中數位已被世人遺忘，但是唐旺旺一家以此技藝為家族男丁特有傳承，至今已有五代。這類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與技藝在中國的引入與傳續，實在是值得我們繼續追索的課題。

不過，此時期徐家匯博物院的研究雖有上述的貢獻，但是研究成果多以法文出版，可見當時該機構的學術對話對象仍以法國或國際自然史學者為主，而非中國當地人士。這樣的情形到了震旦博物院時期已有明顯轉變，該院不僅與中國當

---

年十二月八日），交大校園完全遭日軍佔據，而法租界尚未淪陷，因此大部份學生是在震旦大學內上課，該校與震旦大學因此有相當程度的淵源。有關這段歷史，可見盛懿、孫萍、歐七芹主編，《三個世紀的跨越：從南洋公學到上海交通大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頁 169-173。

戴麗娟

地的科學機構與人才有頻繁的往來和合作，也與大學內的教學有相當程度的結合，同時更透過對外開放參觀，增添了科學普及於大眾的功能。在一般認為是中國近代科學發展「黃金時期」的一九三〇年代，處於震旦大學內的自然史博物院做出了令當時中國科學界肯定的貢獻，卻被後人漸漸遺忘。它的歷史因此值得我們投以更多的關注。

（本文於民國一〇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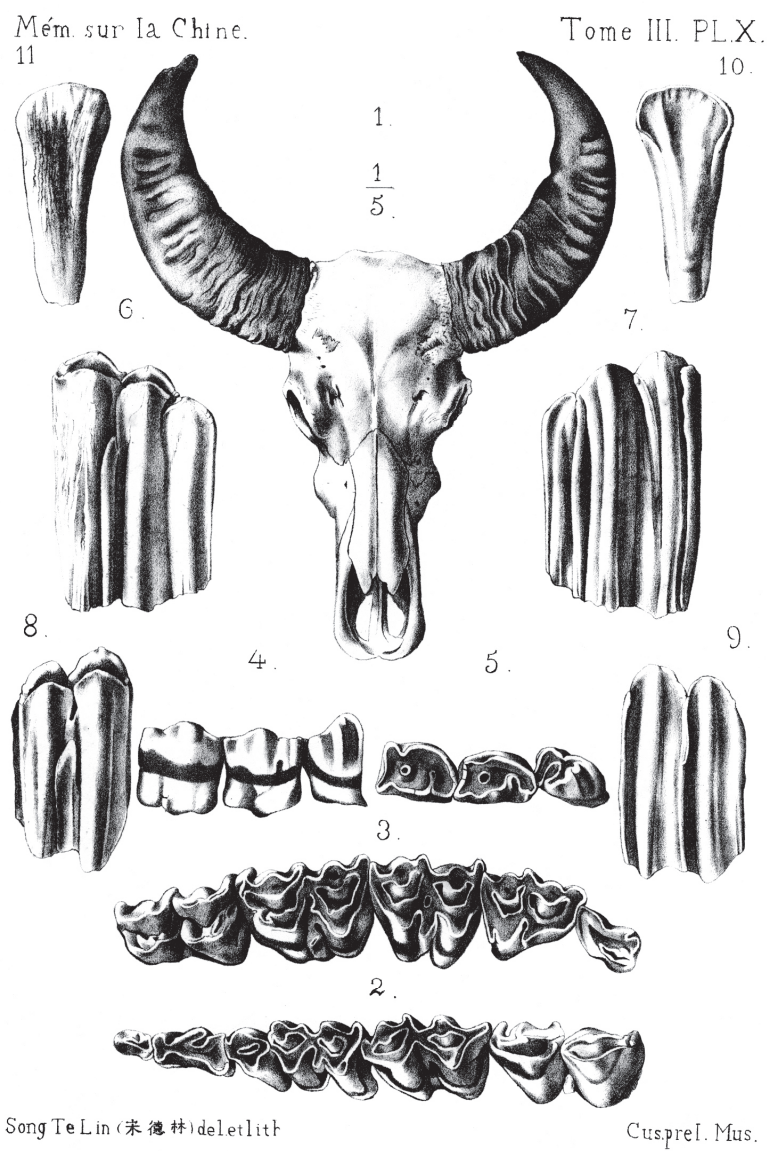
本研究已進行多年，期間曾有數次公開報告的機會。最初期的部分研究所得曾以「震旦博物院與二十世紀前期中國自然史發展」為題，在天主教輔仁大學主辦的「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東西方對話的初啟與開展」（2010年4月19-22日）中報告。晚近較完整的成果也曾以「一座被遺忘的博物館——震旦博物院」為題，在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主辦的「遺產、旅遊與博物館：人類學的展望」研討會（2012年6月2-3日）中發表。筆者於此要特別感謝兩個主辦單位，尤其是陳方中教授與張先清教授的邀請。隨著文獻材料的增添與查證，目前通過審查而得以正式發表的這份論文比先前的報告又增加些許篇幅，筆者感謝兩位不具名審查人的審閱與建議。最後，對於這幾年間先後協助搜尋相關資料的林巧湄、吳欣芳、戴瑋琪小姐，在此一併致謝。

Mém. sur la Chine.

T.II PL.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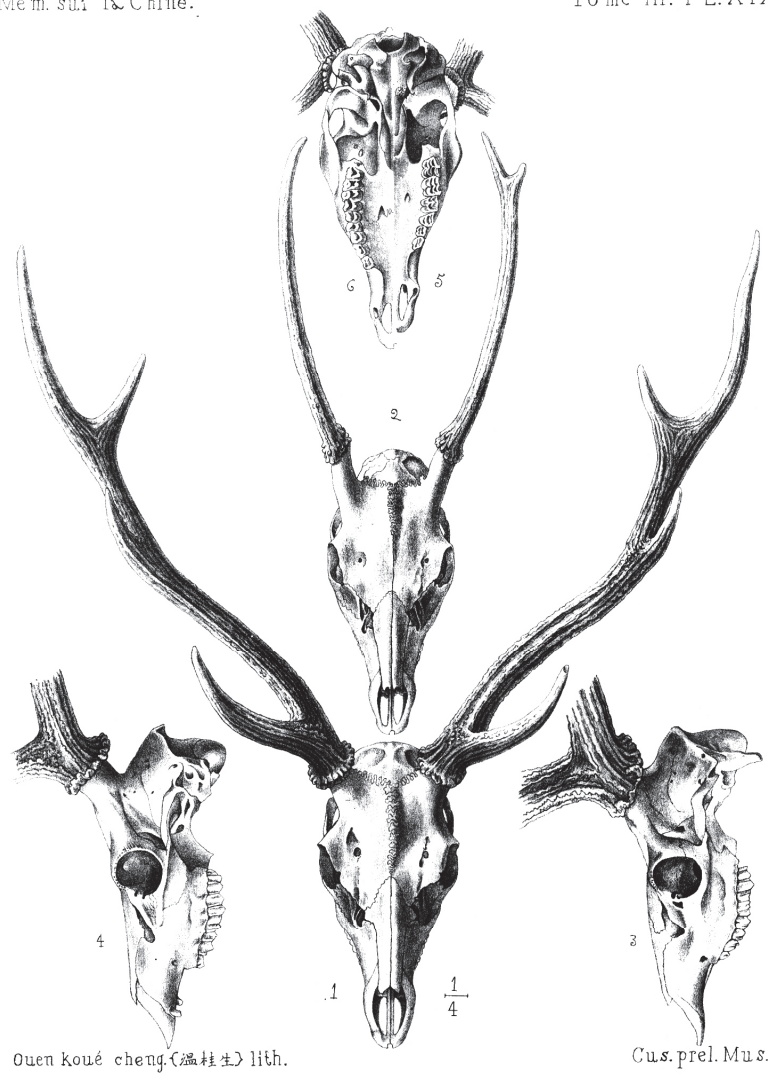
圖一：蔣其儀神父所繪之標本圖（《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第二冊，圖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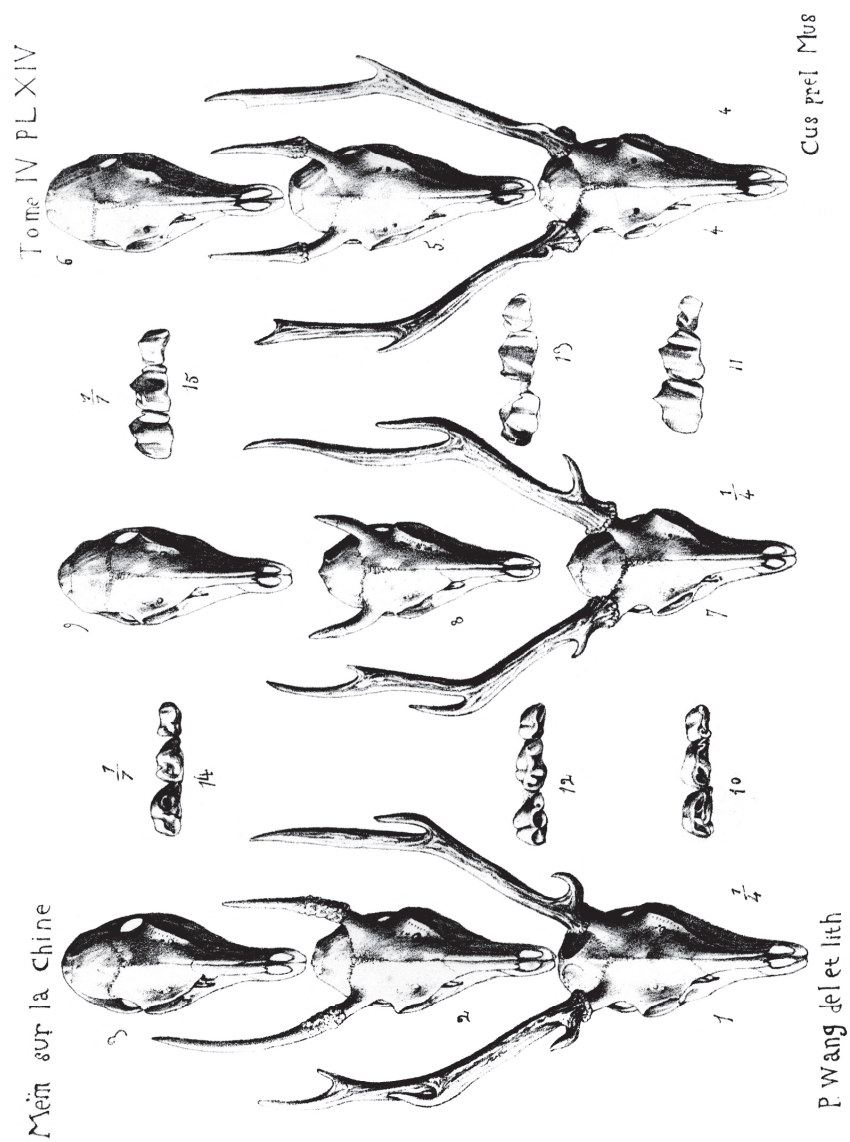
圖二：宋德林所繪之標本圖（《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第三冊，圖版十）

Mém. sur la Chine.

Tome III. PL. XIX.



圖三：溫桂生所繪之標本圖（《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第三冊，圖版十九）



圖四：P. Wang 所繪之標本圖（《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第四冊，圖版十四）



圖五：Yang 所繪之植物標本圖（《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第六冊，圖版七）

Tome IV, PL XXII

Mém. sur la Chine.



Cus. prel Mus

圖六：蔣其儀神父與宋德林合繪之群鹿彩圖  
（《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第四冊，圖版二十二）



圖七：震旦博物院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中，  
中國科學社與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致贈之賀幛  
(R. P. Flamet, "Le Musée Heude, ses fondateurs et ses richesses scientifiques,"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39 (1938-1939): 46-50.  
此為文中所附相片，無頁碼)

## 附錄一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 (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 出版目錄

### Tome 1.

1<sup>er</sup> cahier, 1880.

- P.-M. Heude, “Mémoire sur les trionyx” (鰐類研究) .
- C. Rathouis, “Etude sur le *coccus pé-la*” (白蠟介殼蟲研究) .
- 12 幅圖版。

2<sup>e</sup> cahier, 1882.

- P.-M. Heude, “Notes sur les mollusques terrestres de la vallée du fleuve Bleu” (關於長江流域陸上軟體動物) .
- 10 幅圖版。

3<sup>e</sup> cahier, 1885.

- “Notes sur les mollusques terrestres de la vallée du fleuve Bleu (*suite*)” (關於長江流域陸上軟體動物，續) .
- C. Rathouis, “Appendice: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s mœurs et habituels du *Rathousia Leonina*” (附錄：關於雷歐尼納拉索蛞蝓生活習慣的幾點觀察) .
- “Catalogue des cerfs tachetés (Sikas) du musée de Zi-Ka-Wei ou Notes préparatoires à la monographie de ce groupe” (徐家匯博物院梅花鹿標本目錄，或針對此類別之專題研究的準備筆記) .
- 10 幅圖版。

4<sup>e</sup> cahier, 1890.

- “Dernières notes sur les mollusques terrestres de la vallée du fleuve Bleu” (關於長江流域陸上軟體動物之最新說明) .
- 11 幅圖版。

### Tome 2.

1<sup>er</sup> cahier, 1888.

- P.-M. Heude, “Etudes sur les ruminants de l'Asie orientale. Cerfs des Philippines et de l'Indo-Chine” (東亞反芻類動物研究：菲律賓與印度支那半島的鹿) .
- 21 幅圖版。

2<sup>e</sup> cahier, 1892.

- P.-M. Heude, “Etudes odontologiques: Première partie. Herbivores trizygodontes et dizygodontes” (牙齒研究：第一部份，三對突齒與兩對突齒之草食動物) .

- “P.-M. Heude, “Etudes sur les Suilliens” (古豬研究) .
- 10 幅圖版。

3<sup>e</sup> cahier, 1894.

- P.-M. Heude, “Etudes odontologiques: Deuxième partie” (牙齒研究：第二部份) .
- P.-M. Heude, “Catalogue révisé des cerfs tachetés (Sikas) de la Chine centrale” (華中地區梅花鹿標本目錄修訂) .
- 15 幅圖版。

4<sup>e</sup> cahier, 1894.

- P.-M. Heude, “Etudes odontologiques: Première partie. Herbivores trizygodontes et dizygodontes” (牙齒研究：第一部份，三對突齒與兩對突齒之草食動物) .
- P.-M. Heude, “Etudes sur les Suilliens” (古豬研究) .
- “Notes sur le genre *Capricornis*” (關於羚羊屬之筆記) .
- “Notes sur le genre *Kernas*” (關於斑羚屬之筆記) .
- 12 幅圖版。

### **Tome 3.**

1<sup>er</sup> cahier, 1896.

- P.-M. Heude, “Etudes odontologiques: La quatrième prémolaire supérieure des Herbivores. Les dents de lait des paridigités et la nomenclature osbornienne” (牙齒研究：草食動物上顎小白齒，裂足動物之乳牙與奧斯朋分類表) .
- P.-M. Heude, “Etudes odontologiques: Seconde partie. Mammifères Carnassiers” (牙齒研究：第二部份，肉食性哺乳動物) .
- P.-M. Heude, “Essai sur l’armure frontale des ruminants ou Examen du passages transformistes par ses organes” (論反芻動物前額自衛武器：關於經由器官而發生的物種變化之研究) .
- “Notes sur un buffle de Mindanao, *Bubalus Mainitensis*” (關於民答那峨島一種水牛「馬尼特水牛」之筆記) .
- “Aperçu sommaire du genre *Hippelaphus*, groupe de la famille des Cervidées propre aux îles Malaises” (馬來諸島特有的紅鹿屬概觀) .
- 10 幅圖版。

2<sup>e</sup> cahier, 1897.

- P.-M. Heude, “Essai sur l’armure frontale des ruminants ou Examen du passages transformistes par ses organes” (論反芻動物前額自衛武器：關於經由器官而發生的物種變化之研究) .
- P.-M. Heude, “Etudes odontologiques: Seconde partie. Mammifères Carnassiers” (牙齒研究：第二部份，肉食性哺乳動物) .

戴麗娟

- “Genres *Hippelaphus*” (紅鹿屬) .
- “Catalogue révisé des cerfs tachetés” (梅花鹿標本目錄修訂) .
- 10 幅圖版。

3<sup>e</sup> cahier, 1897.

- “Catalogue révisé des cerfs tachetés” (梅花鹿標本目錄修訂) .
- P.-M. Heude, “Etudes odontologiques: Seconde partie. Mammifères Carnassiers” (牙齒研究：第二部份，肉食性哺乳動物) .
- “Notes sur le quatrième capricorne du Tonkin” (關於北圻第四種羚羊之筆記) .

4<sup>e</sup> cahier, 1897.

- P.-M. Heude, “Etudes odontologiques: Seconde partie. Mammifères Carnassiers” (牙齒研究：第二部份，肉食性哺乳動物) .
- P.-M. Heude, “Etudes sur les Suilliens. chapitre IV. Sangliers chinois” (古豬研究：第四章，中國野豬) .
- “Capricornes de Se-tchouan” (四川之羚羊屬動物) .
- 11 幅圖版。

**Tome 4.**

1<sup>er</sup> cahier, 1898.

- “Capricornes de Se-tchouan” (四川之羚羊屬動物) .
- “Notes sur l’ours et ses parents” (關於熊及其近親之筆記) .
- “Questions sur l’*Enhydri*, l’ours et l’otarie” (關於水蛇屬、熊與海獅科之問題) .
- “De l’*apophyse angulaire* chez les Carnivores Placentaires et Marsupiaux” (胎盤類與有袋類食肉目動物之角的突起) .
- P.-M. Heude, “Etudes sur les Suilliens” (古豬研究) .
- 11 幅圖版。

2<sup>e</sup> cahier, 1898.

- “Etudes odontologiques. Troisième partie.” (牙齒研究：第三部份) .
- “Catalogue révisé des cerfs tachetés (Sika)” (梅花鹿標本目錄修訂) .
- 11 幅圖版。

3<sup>e</sup> cahier, 1899.

- P.-M. Heude, “Etudes sur les Suilliens. Sangliers chinois” (古豬研究：中國野豬) .
- “Premier révisé du genre *Ussa*. H. et rectification de nomenclature” (H. 鹿屬第一次修訂) .
- “*Ailuropus* et *Ursus*” (大熊貓與熊屬動物) .
- 13 幅圖版。

4<sup>e</sup> cahier, 1899.

- “Etudes odontologiques: Quatrième partie. Quadrumanes”（牙齒研究：第四部份，四肢皆可當手用的靈長類動物）。
- “Catalogue révisé des Sikas”（梅花鹿標本目錄修訂）。
- “Capricornes”（羚羊屬動物）。
- 10 幅圖版。

#### **Tome 5.**

1<sup>er</sup> cahier, 1901.

- “Notes sur quelques Ursidés peu ou point connus”（關於幾種罕為人知或不為人知的熊科動物）。
- “Crânes de quelques Herbivores”（幾種草食動物的頭顱）。
- 11 幅圖版。

2<sup>e</sup> cahier, *Le P. Heude et le Musée de Zi-Ka-Wei*（韓伯祿神父與徐家匯博物院），1906.

- F. Courtois, “Le P. Heude et le Musée de Zi-Ka-Wei”（韓伯祿神父與徐家匯博物院）。
- F. Courtois, “Appendice: Note sur les Ursides du Musée de Zi-Ka-Wei”。

3<sup>e</sup> cahier, *Les oiseaux du Musée de Zi-Ka-Wei*（徐家匯博物院鳥類標本），1914.

- Fr. Courtois, “Avis relatif aux planches”（關於圖版之說明）。
- “Index des nids”（鳥巢目錄）。
- “Index ovologique”（卵之目錄）。
- 45 幅圖版。

#### **Tome 6.**

1<sup>er</sup> cahier, *L’herbier de Zi-Ka-Wei, Herborisations dans le Kiang-Sou en 1918*（徐家匯博物院植物標本、1918 年江蘇植物採集），1920.

- “L’herbier du Musée de Zi-Ka-Wei”（徐家匯博物院植物標本）。
- “Liste des récoltes botaniques. Kiang-Sou. 1918”（1918 年江蘇植物採集目錄）。
- 23 幅圖版。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中國博物館協會，《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1.1 (1935)。
- 中國博物館協會，《中國博物館一覽》，北平：中國博物館協會，1936。
- 佚名，〈創設博物院〉，《申報》1875.11.04，收入上海申報館編，《申報影印本：一八七五年七月—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上海：上海書店，1983，第7冊，頁433。
- 佚名，〈土山灣印刷所五旬金慶誌盛〉，《聖教雜誌》1920.6：284-285。
- 佚名，〈震旦大學新建博物院行奠基禮誌盛〉，《聖教雜誌》19.6 (1930)：285。
- 佚名，〈韓氏博物院七十週年紀念〉，《震旦醫刊》4.4 (1939)：324-329。
- 佚名，〈江南育嬰堂記目錄〉，鐘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第5冊，頁2487-2621。
- 胡道靜，〈震旦博物院史略〉，上海通社主編，《舊上海史料匯編》(193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下冊，頁379-391。
- 國立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研究院職員錄（民國十八年度）》，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1929。
- 震旦大學編，《私立震旦大學一覽》，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5。
- Anonymous. "Chronique du 2<sup>e</sup> semestre 1930."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21 (1930): 91-95.
- . "Obituary: John David Dignes La Touche." *Ibis* 77.4 (1935): 889-890.
- . "A la mémoire du Père Piel, directeur du Musée Heude (1935-1945)."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11 (1947): v-vi.
- Becquart, B. "L'entomologie au laboratoire du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rd ser., 3 (1940): 308-312.
- Belval, Henri. *Contribution à la flore du Kiangsou*, coll. «Notes de botanique chinoise», n° 1. Shanghai: Université de l'Aurore and Musée Heude, 1931.
- , ed. *Flore de la région montagneuse du Ngan-Hoei, énumération des plantes récoltées et déterminées par le P. Courtois au cours des années 1906-1922*, coll. « Notes de botanique chinoise », n° 2. Shanghai: Université de l'Aurore and Musée Heude, 1933.

- Clark, Robert Sterling, and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rough Shên-kan: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9*. London: T. F. Unwin, 1912.
- Cordier, Henri. "Armand David." *T'oung Pao* 2.1 (1901): 94-96.
- Courtois, Frédéric. "Le P. Heude et le musée de Zi-ka-wei."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 5.2 (1906): 1-32.
- . "L'herbier de Zikawei: Herborisation dans le Kiangsou en 1918."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 6.1 (1920): 1-136.
- David, Armand. *Journal de mon troisième voyage d'exploration dans l'empire chinois*. Paris: Hachette, 1875.
- Dehergne, Joseph. "Le fonds Sowerby."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rd ser., 24 (1945): 812-815.
- . "Les débuts d'un naturaliste en Chine: Les premiers voyages du Père Heude, d'après son Journal et ses Lettres (1868-1875)."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rd ser., 30 (1947): 192-243.
- Dehergne, Joseph, and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hronique du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rd ser., 28 (1946): 678-680.
- Fauvel, Albert A. "Report of the Curator for the Year 1878."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13 (1879): xiii-xviii.
- . "Alligators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13 (1879): 1-36.
- Ficher, Henri. "Le R. P. Heude, nécrologie." *Journal de conchyliologie* 52.4 (1904): 372-376.
- Flamet, R. P. "Le Musée Heude, ses fondateurs et ses richesses scientifiques."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39 (1938-1939): 46-50.
- La Servière, Joseph d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Jesuites de la Province de France (Paris)*. Zi-ka-we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14.
- .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son histoire, son état présent*. Zi-ka-we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14.
- La Touche, John David Digues. "The Collection of Bird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40 (1909): 69-77.
- .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25-1934.

戴麗娟

- Piel, Octave. "Activité du Musée Heude pendant l'année 1935."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33 (1935-1936): 12-13.
- . "Le Révérend Père A. Savio, S.J. (1882-1935)."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entomologique de France* 105 (1936): 6.
- . "Le 70<sup>e</sup>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39 (1938-1939): 56-59.
- Savio, Auguste. "Le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25 (1931-1932): 1-13.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Notes on Heude's Bears in the Sikawei Museum, and on the Bears of Palaearctic Eastern Asia." *Journal of Mammalogy* 1.5 (1920): 225.
- . "T'ang Wang Wang."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6.2 (1932): 57-59.
- . "Sociétés and Institutions: the Heude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9.1 (1933): 48-50.
- .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9.5 (1933): 219-225.
- . "The Personnel of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9.5 (1933): 225.
- . "The Naturalists' Club of Shanghai."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23.6 (1935): 395.
- . *China's Natural History: A Guide to the Shanghai Museum (R.A.S.)*.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1936.
- V. P. "Le Musée Heude: Un an d'activité scientifiqu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2nd ser., 28 (1933-1934): 78-81.
- Vosy-Bourbon, H. "Honorary Curator's Report."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27 (1895): 222-223.
- Wang, Chung-nie. "Index bibliographique sur l'entomologie chinoise."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 7.10 (1940): 205-462.

## 二・近人論著

王思明、周堯

1995 《中國近代昆蟲學史 (1840-1949)》，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王毅

2005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上海：上海書店。

王興義、吳雲瑞

1942 〈中國藥物展覽會之概況〉，《震旦醫刊》7.2-3：147-16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

1981 《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方豪

1954 《中西交通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第5冊。

丘濂

2010 〈標本唐：一個家族的標本製作傳奇〉，《三聯生活週刊》579：90-95。

庄小鳳、馬學強主編

2010 《西學東漸第一校：從徐匯公學到徐匯中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江曉原、吳燕

2004 《紫金山天文台史稿：中國天文學現代化個案》，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江滢河

2007 《清代洋畫與廣州口岸》，北京：中華書局。

李又寧

1993 〈曾昭燏 (1909-1964)——我國最傑出的女性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學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5-48。

李純康

1998 〈上海學校溯源〉，上海通社主編，《舊上海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下冊，頁345。

宋浩杰主編

2005 《歷史上的徐家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土山灣記憶》，上海：學林出版社。

吳崢嶸

2007 〈百年“標本唐”〉，《檔案春秋》2007.2：14-18。

吳嘉陵

2006 《清末民初的繪畫教育與畫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胡宗剛

2005 《靜生生物調查所史稿》，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戴麗娟

胡鴻興

- 1981 〈唐家的鳥：記武漢大學生物系標本室高級工程師唐瑞昌〉，《大自然》1981.2：21-23。

南京博物院編

- 2009 《曾昭燏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孫英寶、馬屢一、覃海寧

- 2008 〈中國植物科學畫小史〉，《植物分類學報》46.5：772-784。

徐悲鴻

- 1943 〈新藝術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時事新報》1943.03.15，收入王震、徐伯陽主編，《徐悲鴻藝術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

高蓓

- 2009 《「土山灣孤兒院美術工場」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論文。

張寧

- 2000 〈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對抗「鳥類屠害者」，1890-19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4：89-144。

張劍

- 2005 《科學社團在近代中國的命運：以中國科學社為中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張曉依

- 2009 〈土山灣印書館西文資料考述〉，復旦大學歷史系、出版博物館編，《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上海：百家出版社，頁 321-337。

許明龍

- 2005 〈中國學界近年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之管見〉，古偉瀛編，《東西交流史的新局：以基督宗教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25。

陳勝崑

- 1984 《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盛懿、孫萍、歐七芹主編

- 2006 《三個世紀的跨越：從南洋公學到上海交通大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黃一農

- 1996 〈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7.1：137-169。

黃書光

- 2004 《國家之光人類之瑞：復旦大學校長馬相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黃樹林主編

- 2010 《重拾歷史碎片：土山灣研究資料粹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曾昭燏

- 1943 《博物館》，重慶：正中書局。

萬青力

- 2005 《並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紀中國繪畫史》，臺北：雄獅。

鄒振環

- 2010 〈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1-14。

翟啟慧、胡宗剛主編

- 2006 《秉志文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一卷。

趙慶源編著

- 1980 《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臺南：聞道出版社。

震旦大學校友會主編

- 2002 《震旦大學建校百年紀念 1903-2002》，上海：震旦大學校友會。

繆思

- 2011 〈土山灣木工部主任——葛承亮〉，《土山灣》13：34。

戴勝

- 1988a 〈福爾摩莎大探查——博物學家史溫侯在台的觀測〉，劉克襄策劃，宋文薰等著，《探險家在台灣》，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頁 19-26。

- 1988b 〈樹蛙、長毛象、原住民——自然科學家拉圖許的徒步之旅〉，劉克襄，《探險家在台灣》，頁 81-94。

戴麗娟

- 2008 〈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95-161。

戴麗娟

- 2009 〈在「邊緣」建立「中心」——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輔仁歷史學報》24：229-256。

羅桂環

- 2005 《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Boutan, Emmanuel

- 1993 *Le nuage et la vitrine: Une vie de Monsieur David*. Bayonne: Editions Raymond Chabaud.

Braun, Anja, Colin P. Groves, Peter Grubb, Yang Qi-Sen, and Xia Lin

- 2001 “Catalogue of the Musée Heude collection of Mammal Skulls.”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動物分類學報) 2001.4: 608-660.

Fan, Fa-Ti (范發迪)

- 2004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urtz, Joachim

- 2010 “Messenger of the Sacred Heart: Li Wenyu (1840-1911) and the Jesuit Periodical Press in Late Qing Shanghai.” In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edited by Cynthia Brokaw.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p. 81-109.

Kusukawa, Sachiko

- 2012 *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 Image, Text and Argu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Human Anatomy and Medical Bota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my, Denis

- 2008 “Le dessin botanique dans la transmission des connaissances.” In *Passions botaniques: naturalistes voyageurs au temps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Rennes: Editions Ouest-France, pp. 139-154.

Nelson, E. Charles

- 1994 “Charles Rathouis’s painting (1889) of Augustine Henry’s Goral from the Yichang Gorges, China.”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21.1: 43-47.

Puga, Rogério Miguel

- 2012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 575-586.

Sowerby, Richard Raine

- 1956 *Sowerby of China: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Stevens, Keith

- 1998 “Naturalist, Author, Artist, Explorer and Editor and An Almost Forgotten President: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 President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1940.”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38: 121-136.

Tiedemann, Rolf Gerhard

- 2009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M. E. Sharpe.

### 三・網路資訊

「上海市地情資料庫：唐旺旺」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429/node4432/node70711/node70715/node70723/userobject1ai54307.html> (瀏覽 2010.01.24)

“Albert Joseph Marie de Cooman,”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Archives*.

<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de-cooman-1> (瀏覽 2013.02.02)

The John Reeves Collections.

<http://www.nhm.ac.uk/nature-online/art-nature-imaging/collections/reeves/index.html> (瀏覽 2011.10.17)

## From Zikawei Museum to Heude Museum: The Natural History Research of French Jesuits in Modern China

Li-chuan Ta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While the role played by the Jesuits i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has been well researched, mos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beginning of the Qing, with research into the late imperial Qing and Republican eras being comparatively sparse. Focusing on a natural history museum founded in Shanghai by French Jesui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is article retraces the major activities of this scientific institution which existed for more than 80 years but has now been largely forgotten.

The article considers two distinct periods of time, analyz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of the museum during each period.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1868-1930), when it was known as Zikawei Museum, the first point highlighted involv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founding father, Pierre Marie Heude, and his successors in building specimen collections once considered unmatched, quantitatively, in all of East Asia. The article also emphasizes the scientific illustrations drawn and lithographed by the orphans of Tushanwan that appeared i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museum and trac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related techniques into China. When interacting with local scientific communities, the museum generally offered specimen identification services to those requesting it and collaborated closely with Shanghai Museum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in train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taxidermists.

During the second period (1930-1952), when it was renamed Zhendan Museum (or, in English, Heude Museum) after merging with Zhendan University (Aurora University), the museum began to develop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s, with priests working in the museum also teaching students. As for scientific exchange, the museum sought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especially entomologists, an effort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its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Through exhibitions organized in this period, we can also observe that this museum tried to enhance its efforts at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In 1952, Heude Museum, which had tried to continue its activities after the war, was finally forced to close along with Aurora University at the orders of the new political authorities. This article brings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stitution and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biology, topics which have been largely ignored since the museum's closure.

**Keywords: French Jesuits, Zikawei Museum, Heude Museum, Shanghai Museum, Shanghai scientific enterprises**